

# 誰的富強之業—— 中、日、越三國參觀者對於1902年 河內博覽會的觀察與書寫

羅景文\*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博覽會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消費主義緊密合拍，更使其成為各殖民者既相互觀摩，又彼此競爭交鋒的場域。在近代博覽會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法國，曾於1902年藉慶祝滇越鐵路通車為由，舉辦過唯一一次在其本國國土之外的「河內博覽會」，用以介紹安南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法國殖民越南的實力與治績。除了法國及殖民地法屬印度支那之外，東亞多國及各殖民地亦帶著不同的目的和期待參展。法殖民者欲藉此博覽會展示權力、宣揚治績，但中、日兩國參觀者則從法方在策展過程中的倉促失當，批評法人的殖民政策以及隱藏於其後的野心。越南知識人黎文敵對於法殖民者有著複雜的感受，他一方面擁護、歌頌法殖民者，但另一方面也清楚地認識到越南被殖民的現實處境。而除了關注法越關係之外，河內博覽會也是中、日兩國自我展示與言說，彼此觀看、相互競逐的場域。本文透過各國參觀者的紀錄與書寫，觀察他們在西方知識及科技架構、文明象徵與殖民處境下，對博覽會不同層次的體驗與態度，進而理解東亞各國乃至於東西方在相互觀照之下，彼此的形象認知與國家想像。

關鍵詞：博覽會、越南河內、殖民、展示與凝視、黎文敵

---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博覽會(exhibition)最早可追溯至十八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由英國率先舉行，雖然規模不大，但具有綜合展示各項工商產品、嶄新器物與藝術品的作用。<sup>1</sup>日人吉見俊哉在研究博覽會時發現，隨著大航海時代與博物學時代的進展，西方帝國逐漸演變出一套以視覺「凝視」被殖民他者的制度，藉以安排或支配被觀看的客體，並在展示客體的過程，顯示自我主體的意志及權力，例如博物館、植物園與動物園便是這種機制的運作。而這種制度後來「被博覽會利用工業技術加以發揚光大，並總結在奇觀(spectacle)的形式之中」。<sup>2</sup>1851年英國倫敦水晶宮萬國工業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的揭幕，便宣告博覽會將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消費主義密切結合的趨勢，成為各國各殖民者既相互觀摩，卻也是彼此較量、交鋒的場域。<sup>3</sup>面對英國成功辦會的刺激，法國亦不甘示弱，相當積極地於1855、1867、1889、1900等年，在巴黎舉辦大規模的國際性博覽會。在這過程中不僅興建了許多建築物或是紀念性的物件作為展區，更將整個巴黎市營造出一大博覽會的氛圍，從而吸引了可觀的參觀人數。因此，博覽會的舉行

<sup>1</sup> 趙祐志，〈躍上國際舞臺——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頁287。關於「博覽會」、「萬國博覽會」之定義和相關對譯詞「Great Exhibition」、「Exposition Universalle」、「World Fair」的討論，參見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博覽會的政治學》，頁22。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27-28。

<sup>2</sup> 關於西方帝國在大航海時代與博物學時代「發現」世界、「觀看」世界的方式，以致於後來影響到博覽會展示形式及其意義的討論，詳見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博覽會的政治學》，頁2-21。引文則見頁15。

<sup>3</sup> 1851年倫敦萬國博覽會所展示的豐富意義及其歷史定位，參見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博覽會的政治學》，頁26-59。呂紹理，《展示臺灣》，頁47-57。

除了用以交流技術、促進生產、行銷產品與發展貿易之外，更透過有組織、有策略及有目的的陳列方式，展現出獨特的觀看視角、分類標準，乃至於形成新的知識架構、思維體系與消費文化。誠如呂紹理所言，博覽會表現出全新的觀看與展示文化，形塑嶄新的生活價值與行為，並與消費文化緊密聯繫，「而隱藏於其後的，則是各種各樣的族群認同、國族建構與競合的象徵意義」。<sup>4</sup>

至於越南又是如何進入現代博覽會的範疇之中？越南人何時漫步於城市與展場之間，觀看各種新鮮或令人驚心動魄之事物？嗣德皇帝(Tự Đức, 1829-1883, 1847-1883 在位)曾趁著 1878 年法國在巴黎舉辦萬國博覽會的機會(展期為 1878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派遣阮誠意(Nguyễn Thành Ý, 1820-1897)和阮增阮(Nguyễn Tăng Doãn)等人攜帶展品參加展覽，並派人到土倫港(Port of Toulon)學習先進技術。<sup>5</sup>可惜的是，這次似乎沒有留下太多紀錄，可以讓我們了解當時越南使臣參與博覽會的情形。越南士人真正能走入博覽會的會場，體驗新奇有趣的科學器物，感受強烈鮮明的文化差異，大概要在 1884 年法國全面佔領越南之後，因為阮朝朝廷受到法國的殖民保護，使得雙方有了更頻繁的互動，越南官員或士人出於各種主動或被動的原因，而前往由法國主辦或主導的各種博覽會。在 1889 年與 1900 年，均有越南使臣或士人參與或參觀法國巴黎萬國博覽會的記錄，前者如有阮福綿豪(Nguyễn Phúc Miên Triện, 1833-1905)、武文豹(Vũ Văn Báo)、阮澂(Nguyễn Trùng)所撰之《己丑年如西日記》(*Ki Siu Niên Như Tây Nhật Kí*)，後者則有越南使臣武光珩(Vũ Quang Nha, 1847-1932)、陳廷量(Trần Đình Lượng)、黃仲敷(Hoàng Trọng Phu, 1872-1946)所撰之《使西日記》(*Sứ Tây Nhật Kí*)。這些官員不僅觀看了本國場館和展品，

<sup>4</sup> 呂紹理，《展示臺灣》，頁 48-49，引文見頁 49。

<sup>5</sup> 陳重金(Trần Trọng Kim)著，戴可來譯，《越南通史》(原越文名為《越南史略》，*Việt Nam Sử Lược*)，頁 389。

同時亦考察了博覽會中的各國展場，尤其是特別留心於法國展區的建築設計、展場的擺設方式，以及參展的物件內容，並品評東西方各國展示物。<sup>6</sup>

值得注意的是，法國不僅在其國內大肆舉行博覽會，亦於 1902 年 11 月 16 日至 1903 年 1 月 25 日在其殖民地印度支那(Indochina)舉辦了「河內博覽會」(Hanoi Exhibition, 法文 Exposition de Hanoi)，這也是法國在海外所舉辦過的唯一一次博覽會。博覽會為何選在河內舉辦？阮朝於同慶三年(1888)正式割讓河內、海防和峴港三地給法國。河內正好是中南半島、東南亞前往中國廣東、廣西、雲南三省之重要孔道，從位置和交通來看，河內具有重要的經濟和戰略意義。這也是為何殖民政府於 1902 年將印度支那聯邦(Indochinese Federation)首府從西貢遷到河內的主要原因。而根據當時印度支那總督(Governors-General of French Indochina)保羅·杜美(Paul Doumer, 1857-1932, 任期為 1897 年 2 月至 1902 年 10 月)的回憶，他提到河內的街區和道路相當狹窄，城區擁擠不堪，也沒有大型的公共建築，與西貢相比雖然顯得發展滯後，身為首都的河內卻反而是殖

---

6 詳見阮福綿豪(Nguyễn Phúc Miên Triện)、武文豹(Vũ Văn Báo)、阮澂(Nguyễn Trùng)，《己丑年西行日記》(*Kỉ Sửu Niên Như Tây Nhật Ký*)，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藏抄本。武光珩(Vũ Quang Nhạ)、陳廷量(Trần Đình Lượng)、黃仲敷(Hoàng Trọng Phu)，《使西日記》(*Sứ Tây Nhật Ký*)，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藏抄本。上述官員合著之參訪日記，類似今日官方的出國報告書。附帶一提，1900 年隨武光珩等人出訪法國者，尚有副使徐淡(Từ Đàm, 1862-1936)，他著有《覽西紀略》(*Lãm Tây Kỳ Lược*)一書，記錄 1900 年參訪法國之見聞。現有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藏抄本。另有署名「北江巡撫陳大人」，即為陳廷量所著之《西行日程》(*Tây Hành Nhật Trình*)，此書為陳氏 1900 年出使法國的見聞記錄，以六八體喃詩書寫，現有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藏抄本。感謝審查人提醒。

民者可以大展身手之處。<sup>7</sup>法殖民者舉辦此次博覽會的目的，表面上是慶祝滇越鐵路通車，但實際上是要宣傳其對印度支那地區的治績與殖民實力，尤其是對新納入疆土的首都河內，同時希望加強各國對印度支那地區的投資及貿易。

這次博覽會的參展國家和地區，除了法國及其殖民地、法屬印度支那之外，尚有東亞各國與各殖民地，臺灣亦有參展。各國帶著不同的目的和期待來參加這次博覽會，多有留下相關書寫紀錄，甚至也有越南知識人關注此事。在各國相關人士彼此觀看之中，其實也暗喻了「博覽會」，即為各國國力的展現與較勁的場域。

目前河內博覽會之研究成果，主要有李丹〈1902年河內博覽會述略〉、檜山幸夫〈ハノイ博覽会と臺灣總督府——パンフレット『EXPOSITION DE HANOI』を中心に〉，以及楠元町子〈万国博覽会に見る明治政府の国際戦略——1902年ハノイ博覽会と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博を中心に〉等三篇文章。李丹透過報刊資料、晚清海關及稅務司檔案，來說明中國在籌備參與河內博覽會的情形，進而探討中越關係的變化、參展之法籍稅務司與中國商人在心態及做法上的差異，以及中方各界人士對於博覽會的不同看法，折映出多元的博覽會面貌。<sup>8</sup>檜山幸夫則透過參與博覽會之臺灣總督府技師柳本通義(1857-1937)的出差報告書(復命書)，以及附在報告書裡之法方出版的河內博覽會相關簡章和出版品，介紹河內博覽會的概況，以及臺灣館代

<sup>7</sup> 詳見 Paul Doumer, *L'Indo-Chine Française: Souvenirs*, 121-125. 根據盧建銘的分析，1886年之後，法人開始於河內修建較大型的建築，如市政廳、郵局、廣場、名人紀念雕像、城市公共休閒設施，以營造出與法國城市相似的氛圍。盧建銘，〈越南法屬時期河內的都市經營策略〉，頁52。

<sup>8</sup> 李丹，〈1902年河內博覽會述略〉，收入馬敏主編，《博覽會與近代中國》，頁147-165。

表柳本通義對該會的觀察，並與相隔一個多月之後舉行的「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相互比較。<sup>9</sup>楠元町子則透過官方檔案和當時新聞報導，探討明治政府在參與河內博覽會及美國聖路易斯博覽會(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時，所反映的態度和國際戰略，這篇正好可以與檜山氏所撰論文相互補充。<sup>10</sup>這三篇文章分別關注中國、日本、臺灣當局和相關人士如何籌備此次博覽會，並檢討後來的成效，提供我們理解河內博覽會的不同視角。但他們各以「中法」或「日法」角度出發，較少討論到中、日、越這三個國家的參觀者，對於彼此的觀察及書寫，因此尚有值得開拓的空間，也是筆者所欲處理的面向。<sup>11</sup>

除了上述中日學者所發掘整理的檔案資料之外，筆者目前也掌握到部分法國官方或近官方觀點之資料，例如《1902 河內博覽會——(印度支那聯邦)首都官方目錄》(*Exposition de Hanoi en 1902: Catalogue Officiel*

<sup>9</sup> 檜山幸夫，〈ハノイ博覽會と臺灣總督府——パンフレット『EXPOSITION DE HANOI』を中心に〉，收入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編纂委員會編，《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第 8 卷，頁 671-700。柳本通義，〈總督府技師柳本通義提出河內博覽會二關スル出張復命書〉，明治三十六年(1903)二月十三日，收入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三十六年永久保存第 7 卷，第 808 冊，頁 1-101。此外，呂紹理，《展示臺灣》一書中亦有介紹，參見頁 111-112。

<sup>10</sup> 楠元町子，〈万国博覽會に見る明治政府の国際戰略——1902 年ハノイ博覽會と 1904 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博を中心に〉，頁 105-120。

<sup>11</sup> 附帶一提，越南學者武氏明香(Vũ Thị Minh Hương)有兩篇略為提及 1902 年河內博覽會的文章，一是〈1945 年以前在河內的展覽和博覽會〉(“Triển Lãm và Hội Chợ ở Hà Nội Trước Năm 1945”)，二是〈通過資料探索舊日河內博覽會〉(“Hội Chợ Đầu Xảo Hà Nội Xưa qua Tài Liệu Lưu Trữ”)。由於篇幅較短，又僅略為介紹，故筆者此不贅述。見 Vũ Thị Minh Hương, “Triển Lãm và Hội Chợ ở Hà Nội trước Năm 1945,” 59-66; “Hội Chợ Đầu Xảo Hà Nội Xưa qua Tài Liệu Lưu Trữ,” B-C.

*Métropolitain*, 以下簡稱《官方目錄》)、<sup>12</sup>《河內博覽會 1902-1903——總報告》(*Exposition d'Hanoï, 1902-1903: Rapport Général*, 以下簡稱《總目錄》)。<sup>13</sup>前者介紹官方籌備河內博覽會之相關組織與委員會，也概述了法屬印度支那的歷史發展、地理環境、經濟模式，甚至是交通旅遊及生活資訊，並說明了參展規定，以及法方預計展出之作品與產品目錄。相較於前者，後者則為博覽會結束之後的總結報告，除了包含前者所載項目之外，增加了對於博覽會各展區之介紹，開、閉幕式及活動過程的記錄，以及獲獎名單等內容。至於《參訪遠東河內博覽會[1902-1903]——總報告》(*Mission à L'exposition de Hanoï et en Extrême-Orient [1902-1903]: Rapport*

<sup>12</sup> Ministère des Colonies,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Exposition de Hanoï en 1902: Catalogue Officiel Métropolitain*. 此為展區之官方目錄。另外，可資參考者如有半月刊《河內博覽會》(*L'Exposition de Hanoï*)，由法人儒勒·格萊茲(Jules Gleize, 1887-1942)出版於巴黎，主要為法人介紹河內博覽會的籌備情形、展區特色、展示內容與品項。該刊每逢5號、20號發行，第1期刊於1902年9月5日，終刊於1902年12月20日，共刊8期。關於此刊物發行時間不長之因，承蒙審查人賜知：「一般博覽會會期約六個月，但河內博覽會僅有三個多月，這也是為何該刊在第1期便通知訂閱者，河內博覽會將在次年夏初結束，故無法接受超過六個月的訂閱」。感謝審查人提醒。又如日人柳本通義關於河內博覽會之「出張復命書」中所附的法文資料：《1902年河內博覽會》(*Exposition de Hanoï en 1902*)、《河內博覽會》(*Exposition de Hanoï*)等兩份小冊子，見柳本通義，〈總督府技師柳本通義提出河內博覽會二關スル出張復命書〉，頁28-101，其中《河內博覽會》被雜入前者之中，見柳本通義，〈總督府技師柳本通義提出河內博覽會二關スル出張復命書〉，頁42-59。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有檔案《仏領東京河内府二於テ万国博覧会開設一件》，其中亦附有法國《河內博覽會》簡章，詳見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仏領東京河内府二於テ万国博覧会開設一件 / 分割1》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明治三十七年三月七日(1899-1904)，頁184-197，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2083569500。

<sup>13</sup> Paul Bourgeois & G.-Roger Sandoz, *Exposition d'Hanoï, 1902-1903: Rapport Général*.

*Général*, 以下簡稱《(馬達加斯加總報告)》),<sup>14</sup>則是法殖民地馬達加斯加的阿爾伯特·迪卡爾(Albert Ducarre, 1869-1954)上尉考察河內博覽會的報告,這份報告特別留意幾個面向,一是該博覽會的目的、組織、運作模式與影響;二是印度支那地區的殖民狀態與統治組織;三是印度支那有關之鄰國或殖民地的情況。該書記錄了各國各地展區及展示品的內容及特色,有助於了解當時博覽會的大致情形。<sup>15</sup>除了中日法等國之相關資料外,筆者後來發現亦有越南士人參與河內博覽會,如黎文敵(Lê Văn Ngũ, 1860-1934)及其《附槎小說》(*Phụ Tra Tiểu Thuyết*)。<sup>16</sup>他不僅描述了河內

<sup>14</sup> Albert Ducarre, *Mission à L'exposition de Hanoi et en Extrême-Orient [1902-1903]: Rapport Général*.

<sup>15</sup> 據審查人賜知此書「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數字圖書館系統 (Gallica) 中有兩個版本,一為抽印本(筆者按:即為筆者所使用之版本),另一則為 1903 年 12 月 9 日 *Journal Officiel de Madagascar et Dépendances* 的 12 月 10 日專號(筆者按:封面上有「Numéro Spécial du 10 Décembre 1903」字樣)。書前有馬達加斯加殖民地主建築師(*architecte principal des colonies à Madagascar*)、土木營繕課主任(*chef du service des bâtiments civils*)安東尼·茉莉(Anthony Jully, 1862-1907, 他也是此報告主撰者阿爾伯特·迪卡爾[Albert Ducarre]的助理專員[*commissaire-adjoint*])所撰之序言,說明任務起源:為法屬殖民地馬達加斯加檢視在另一個法屬殖民地舉行的博覽會,作為前者的參考,這解釋了為何報告中在博覽會目的與組織之後,第一個探討的是馬達加斯加的展覽館,甚至還在其他法屬殖民地與宗主國展區訪視之前。」筆者不敢掠美,謹致謝忱。關於安東尼·茉莉的生平可參見 Alain Jean-Paul, *Dictionnaire de L'ethnologie Malgache*, 166-167.

<sup>16</sup> 黎文敵,《附槎小說》,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藏抄本。根據「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為《附槎小說》所做的提要可知,此書包含黎文敵的法國旅行日記、回國日程記錄、曆數陰陽、策論問答等內容:詳見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黎文敵《附槎小說》提要, [http://140.109.24.175/pasweb/Opac\\_book/book\\_detail.asp?systemno=0000001381](http://140.109.24.175/pasweb/Opac_book/book_detail.asp?systemno=0000001381), 擷取日期:2017 年 11 月 22 日。此書雖以黎文敵隨武光珩等人出訪法國之見聞為主(述及 1900 年的巴黎博覽會),但也包含他參觀 1902 年「河內博覽會」的記錄,本文亦將據此資料展開討論。感謝審查人對此書內容的提醒。

博覽會的盛況，也記錄自己在觀覽各國展場的體驗與感受。他的書寫，正好提供了一種身為被殖民者觀看博覽會的獨特視角。

進一步來說，各國人士帶著不同的期待和目的來參加、觀覽河內博覽會，他們對於各展區特色、展品種類與內容、競賽結果、殖民地人種及民族展示，甚至是遊藝活動，均有所關注與記錄。但究竟要展覽什麼，如何展示，怎麼籌備安排；而在彼此的眼中，誰是文明未開者，誰是已開化者，誰又是能授他國以文明者，其標準為何；各國皆欲於博覽會中展現國力與民族自信，但誰能振興工藝，邁向富強，誰又有亡國之態。上述對於河內博覽會的諸般探問，可藉由各國在看與被看的張力之中，在互為自我與他者關係中的相視和對照，得到更豐富多元的理解和詮釋。

因此，本文將從以下幾個面向，探討各國參觀者對於 1902 年河內博覽會的觀察與書寫：首先，聚焦於中國、日本、越南三國參觀者如何看待法國舉辦博覽會。河內博覽會由法屬印度支那政府於其殖民地越南舉辦，法越關係是筆者首要的關注對象，討論河內博覽會是否如法方所宣稱的那樣成功，是否達到法方原先設定的目標，而這些參觀者在觀覽之際又有什麼感受。其次，從越南知識人黎文敵的書寫切入，探討他對於法殖民者舉辦博覽會的重層態度，並思考形成此重層態度的背後因素，同時兼及中日參觀者對被殖民者越南的觀察。再次，透過歷史脈絡，分析中日兩國參觀者在河內博覽會此一相互競逐的場域，是如何自我言說、看待彼此、相互競逐，並兼及黎文敵觀看兩國展覽的看法。最後為結論。博覽會彷彿是一面鏡子，映照著各國參觀者對於自身及他者的看法。筆者希望透過這些面向的討論，觀察他們在西方知識及科技架構、文明象徵與殖民處境下，對博覽會不同層次的體驗與態度，進而理解東亞各國乃至於東西方在相互觀照之下，彼此的形像認知與國家想像。

## 二、參觀者對展示富強的觀察與感受

1902(光緒二十八年)年 10 月 1 日天津版《大公報》「時事要聞」欄上，曾刊登了一則關於河內博覽會的訊息，其云：

法屬東京消息云：吾法人商務一道，將振興於亞東。凡所以費心勞力，不敢憚煩者，實為地面興旺道路交通，以及民心和洽起見，今年越南河內博覽會之設，吾法之財力富強，亞細亞人民皆可一目了然矣。斯會之舉，為吾法及極東各國農事商務工藝進步所關，各處之預備赴會者，果屬不少，然非為一時之熱鬧，當求其實際而收其成功，切不可徒循故事，致斯會之舉有名無實也。<sup>17</sup>

從文中語氣來看，應該是官方或接近官方者所發出的訊息，主要是邀請各國參加河內博覽會，共襄盛舉。會中不僅可以觀摩各國農工商業之發展，亦可見證法國殖民印度支那之富強雄厚的實力與財力，宣傳其在印度支那殖民的成果。在〈紀安南河內賽會〉這一篇文章則提到：「前任安南總督多馬氏銳意經營，棄西貢而改河內為亞東根據重地，以所得國債二十兆佛郎開賽會，聳全球耳目，饜法人觀聽，而施一己之政策。」<sup>18</sup>多馬氏即杜美總督，他是越南許多重大建設及河內博覽會的規劃與推動者。他在任時，曾於 1898 年向法國政府提出 2 億 7 千萬法郎的貸款計畫，用以發展印度支那地區等各項建設，獲得法國眾議院(Chambre des députés)多數委員的支持。又以 2 千萬法郎(上引文 1 兆為 1 百萬)作為籌辦河內博覽會的費用，而用博覽會來紀念通車的「杜美

<sup>17</sup> 〈時事要聞〉，《大公報》，1902 年 10 月 1 日，「時事要聞」欄，第 3 版。

<sup>18</sup> 〈紀安南河內賽會〉，《選報》，第 48 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二十二日，「藝術小志」欄，頁 26，A 面。

橋」(龍邊橋[Cầu Long Biên]，1902年2月通車，為當時遠東第一長橋)亦耗資6百萬法郎。<sup>19</sup>

杜美也在他自己的回憶錄及殖民政府報告書裡提到，舉辦河內博覽會除了吸引投資、增進貿易，打開印度支那的經貿市場之外，更在於展示法國殖民的進步，舉辦一場「偉大的展覽」(une grande Exposition)，讓安南人和遠東人民肯定「法國文明與殖民權力」(puissance civilisatrice et colonisatrice de la France)。<sup>20</sup>〈海南賽會紀略〉則描述杜美的性格和行事作風：「河內賽會之議，創自前任法國駐安南總督都美。按：都美為人好大喜功，專主開拓疆宇、創建事業。庚子之亂，都美意欲稱勢占住雲南，其志未遂。」<sup>21</sup>杜美是法殖民政府歷任總督中最大力推動大型建設與殖民經濟者，形成了相當極權的「杜美體制」(Doumer Regime)。<sup>22</sup>由此不難想見，舉辦河內博覽會對杜美和法殖民政府的政治性意義，即誇耀法國殖民政策的成功，及其科技工藝的先進、文明及藝術的偉大，以引起全球各國的關注和欽羨，並滿足法人及法國政府的殖民利益，從而

<sup>19</sup> 杜美於該會開展前一個月(1902年10月)離任，改由原駐中國大使(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保羅·博接任。數據2億7千萬來自於楠元町子，〈万国博覽会に見る明治政府の国際戦略〉，頁109；數據6百萬則來自於盧建銘，〈越南法屬時期河內的都市經營策略〉，頁76。

<sup>20</sup> 前引文見 Paul Doumer, *L'Indo-Chine Française: Souvenirs*, 362。後引文語出當時東京(北圻)高級專員(Le Résident Supérieur au Tonkin, 或稱「北圻統使」)奧古斯丁·朱利安·富雷斯(Augustin Julien Fourès, 1853-1915)，見 Paul Doumer, *Situation de l'Indo-Chine (1897-1901): Rapport*, 424。

<sup>21</sup> 〈海南賽會紀略〉，《萬國公報》，第169冊，1903年2月，頁27，A面。

<sup>22</sup> 「杜美體制」是指殖民政府高度中央集權，總督不受議會約束，越南原有的阮氏政權及各地諮議會只能提供建議，不能干預政治，也沒有任何政治權力。換句話說，只考慮法國利益，而不讓也不鼓勵本地人發展自身的政治與經濟活動。詳見李一平，〈論法國對印度支那殖民政策(1887-1940年)〉，頁48-57、97。引文見頁52。

獲得對杜美政策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透過政績的宣示來提高統治威望，使被殖民者認同 / 敬畏，有助於日後殖民統治的進行，所謂「聳全球耳目，饜法人觀聽，而施一己之政策」，<sup>23</sup>都是昭示著法國及法屬殖民政府的富裕強盛。

法殖民政府為舉辦此次博覽會，特別在當時河內市中心偏南的位置，選定一塊靠近新設之河內車站(Gare de Hanoi)約 9 公頃的空地(原賽馬場)，後來擴大為 12 公頃，地點為圖 1 中「EXPOSITION de 1902」處。此一區域地勢較低，多有湖澤，因此圖中可見此區多有湖泊符號，此區以下為越人生活及製作販賣手工藝品之處。若根據盧建銘對法人於河內之建設的統計圖來看(參見圖 2)，編號 38 為河內車站，編號 39 為印度支那鐵路辦公室(Bureau du Chemin de fer de l'Indochine)，1902 年河內博覽會場址即於圖中框處，但此處以下並無較大型或公共性的法人建築。博覽會場址雖非河內市中心(如還劍湖區域)，但有便利交通又鄰近法人區，法人在此辦展仍有空間上的優勢。<sup>24</sup>

---

23 〈紀安南河內賽會〉，《選報》，第 48 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二十二日，「藝術小志」欄，頁 26，A 面。

24 承蒙審查人對河內博覽會舉辦地點之區位特徵的提醒，筆者在此謹致謝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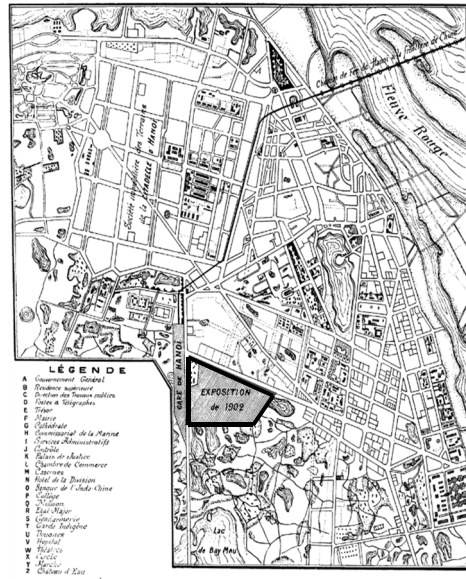


圖1 河內市地圖

資料來源：“Plan de la Ville de Hanoi,” *L'Exposition de Hanoi*, October 1902,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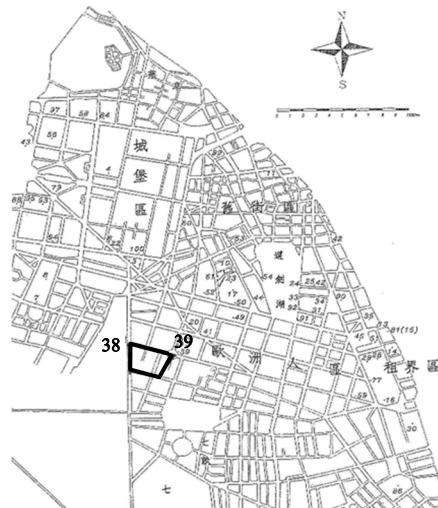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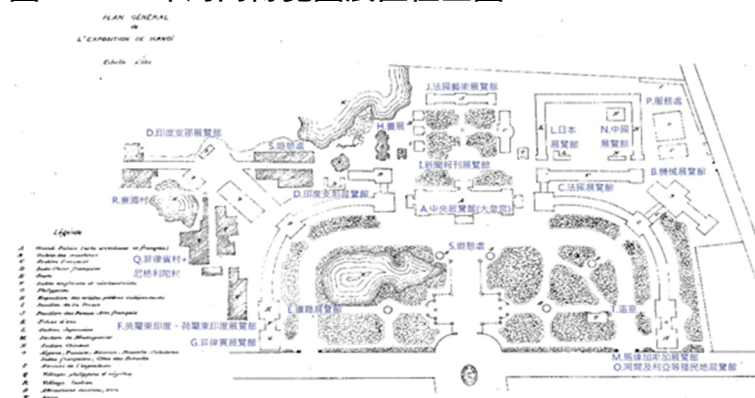


圖2 河內法人建設圖

資料來源：盧建銘，〈越南法屬時期河內的都市經營策略〉，頁209。

說明：法人各時期(1802-1945)具體建設之名稱(即圖中編號)詳見盧建銘，〈越南法屬時期河內的都市經營策略〉，頁210。

圖3 1902年河內博覽圖展區位置圖



資料來源：Albert Ducarre, *Mission à L'exposition de Hanoï et en Extrême-Orient [1902-1903]: Rapport Général*, the image before the book without page numbers.<sup>25</sup>

說明：圖中編號為圖左原有編號，筆者重製以利辨識。

<sup>25</sup>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筆者為何採用這一份博覽會展區位置圖，而其他相關目錄或報告書又是否含有類似的導覽地圖？例如在法國《官方目錄》裡並無附圖，在《總報告》裡則有附圖，其圖與《河內博覽會》半月刊的附圖相同。另外，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仙領東京河內府二於万国博覽會開設一件》，附有法國《河內博覽會》簡章，這份簡章裡附有河內博覽會園區位置圖，但該圖為事前規劃，與實際狀況有些差別，故不採用。該地圖詳見《河內博覽會》簡章，收入於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仙領東京河內府二於万国博覽會開設一件 / 分割 1》，頁 190-191。審查人提醒筆者應留意各展區圖在不同版本上的差異。筆者所使用之展區圖為法屬馬達加斯加策展者所繪（單行本），審查人提到此圖與《河內博覽會》半月刊所繪者不同，尤其是中日兩國展區位置差異甚大。若根據黎文敵在《附槎小說》的記載：「大日本國貯巧堂在正中座後（筆者按：即有大皇宮之稱的中央展覽館），巧場之西邊，其貨物則礦質石質、雕刻木器、磁器花竹、金玉錦繡、破畫水晶，無不備具。」見該書頁 156（此書原無頁碼，此頁碼為筆者所記）。會場以圖片下方為北方，日本居於中央展覽館之後方、西邊，其相對位置則為圖片之右上方，符合法屬馬達加斯加策展者所繪之圖。因此筆者以此為準，不採用《河內博覽會》半月刊所附之圖。不過，審查者有很好的提醒，在未實際展出之前，大部分宣傳品所附之展區圖，多將中國日本兩國展區繪於地圖下方，顯見與當初規劃不同，應與參展國變動或展品數量增減有關。在此感謝審查人的提醒。

再就此博覽會展場空間的配置上來看(參見圖 3)，最主要的展覽館是位於博覽會中軸線上有「大皇宮」(Grand Palais)之稱的中央展覽館(Palais Central)，其建築最為壯麗宏偉，館前道路寬敞整潔，象徵著殖民者的統治威權(參見圖 4)。

圖4 大皇宮正面圖



資料來源：Ministère des Colonies,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Exposition de Hanoï en 1902: Catalogue Officiel Métropolitain*, 46.

在大皇宮正後方則有法國藝術展覽館(Pavillon des Beaux-Arts Française, 代碼 J)、畫廊畫展(Exposition des Artistes Peintres Indépendants, 代碼 H)、新聞報刊展覽館(Pavillon de Presse, 代碼 I)，這些展館用以象徵法國高度的精神文明。大皇宮左右兩側各呈圓弧狀，面向大門的建築物分別是左側的法國展區(Section de Française, 代碼 C)及右側的法屬印度支那展區(Section Indochine Française, 代碼 D)，彷彿是大皇宮一對羽翼，而這兩個展區亦是人們一進博覽會視覺關注的焦點。在這兩個展區的前端，面對大馬路之處(若以建築物之座向為方向)，右側則有暹羅(Pavillon de Siam)、英屬及荷屬東印度(Pavillon de Indes anglaises et Néerlandaises)、菲律賓(Pavillon de Philippines)等地展館(代碼 E、F、G)，左側有阿爾及利亞(Pavillon de Algérie)、馬達加斯加(Pavillon de Madagascar)等地展館(代碼 M、O)。在印度支那展覽館主體建

築(Pavillon de Indo-chine Française, 代碼 D)之後, 仍有一些延伸性的展館(代碼同為 D), 用來展示法屬印度支那各地的物品。在印度支那展覽館周邊, 另有仿擬各殖民地之住民或原住民的村落, 如菲律賓村及尼格利陀村(Villages Philippins et Négritos, 代碼 Q)、寮國村(Village Laotien, 代碼 R)。法國館的正後方則有大型機械展覽館(Galeries des Machines, 代碼 B), 用以標誌法國當時的科學和科技成就。在法國館的斜後方則有中國展覽館(Pavillon de Chinoise, 代碼 N)及日本展覽館(Pavillon de Japonaise, 代碼 L)。就整體來看, 位置越接近大皇宮及其中軸線上的建築越核心, 其距離的遠近也似乎暗喻著法方所認為的文明的開化程度。此次參展品項根據法國《官方目錄》所載, 可分為三大類, 每類之下又再細分, 共有 34 項。此三大類為: 一、考古學、美術、科學、教育; 二、農業、貿易、工業、礦業和冶金; 三、土木工程、公共工程、機械、電力、交通工具。<sup>26</sup> 各國參展品隨著自身農工商業的特色及參展目的的差異, 而各有偏重點。在法方各種籌備之下, 河內博覽會於 1902 年 11 月 16 日盛大開幕。

身為被殖民者的越南知識人黎文啟曾在其作品《附槎小說》,<sup>27</sup> 寫

<sup>26</sup> 詳見 Ministère des Colonies,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Exposition de Hanoï en 1902*, 91, 94, 99. 中日兩國對此三大類及下屬 34 項細目亦有介紹或翻譯, 日本方面詳見〈佛領東京の現況(承前)〉中的「博覽會出品分類表」, 見〈佛領東京の現況(承前)〉, 《臺灣日日新報》, 1901 年 12 月 28 日, 第 4 版。中國方面則有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外交檔案翻譯這些類目, 詳見〈譯送越南河內賽會章程條規請轉達各省任人赴賽由〉, 頁 181-183, 見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 編號 01-27-013-01-077。各大類以下之細目, 及其所對應之日文、中文, 詳見附表 1 1902 年河內博覽會參展品分類暨翻譯對照表。

<sup>27</sup> 目前對於黎文啟的生平所知不多, 大致可知黎文啟字應和, 號「狂士」或「懶士」, 南定省人, 活動範圍多在南定一地, 家境富裕。他 40 歲時前往法國觀覽, 然後回家鄉著書, 也曾與維新會的人士交流, 但未參與他們的活動, 算是一位新舊時期交替的儒者, 晚年則信奉天主教。摘引自梅秋

下了他在河內博覽會中對法國、中國、日本、越南等國展場或展品的觀察。《附槎小說》的內容主要可分為三部分。一是關於黎文敵在 1900 年出訪法國之見聞紀錄，包含當時的法國博覽會。<sup>28</sup>二是他對於宇宙現象及性命理氣等問題之思考。<sup>29</sup>三是河內博覽會的參訪過程和心得。黎文敵對於河內博覽會的介紹和記錄，較參訪巴黎博覽會詳細。關於此書對河內博覽會的記錄共有 12 目。第一日至第三目(參見圖 5)，他先介紹前往河內博覽會之交通方式，以及博覽會之位置、佔地面積、舉行時間、對國家發展之意義。第四目介紹博覽會之中心建築和陳列器物。第五、六兩目，說明左右兩邊展覽館和陳列器物。在第七目(參見圖 6)描述他參觀日中兩國展覽館的過程和心得。第八、九目則關注越南人自身技藝，以及場中的遊藝設施及表演。在第十、十一目，他寫下對其他受殖民之民族的觀察和感慨。第十二目則說明交通資訊與列車時刻。

瓊，〈景印《周易究原》弁言〉，收入黎文敵，《周易究原》，頁 VII-VIII。

<sup>28</sup> 此部分共有 22 個小節：海程記、火輪船記、住館記、商務記、巴移城記(筆者按：原文如此)、氣候記、劇場記、農務記、賽巧場記、綉室記、畫樓記、氣機記、游園記、鑄造局記、學規記、點兵記、礦質記、議院記、究原記、南柯記、埠頭記、回程記。是黎文敵對於法國之政治制度、風土氣候、經濟活動、產業發展、科技器物等方面的觀察、感受與體驗，而不僅止於 1900 年巴黎博覽會，此處限於篇幅及主題未能深究，筆者將於另篇探討。書中與巴黎博覽會有關者為〈賽巧場記〉，文中擇要記錄所見科技器械與遊樂場所，如艾菲爾鐵塔(La Tour Eiffel)、電梯、熱氣球、宛如白晝的電燈等等，同時他也表達舉辦博覽會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看法，見黎文敵，《附槎小說》，頁 26-29。

<sup>29</sup> 此部分如有太極考、臟腑考、黃鍾考、風水辨、星曆辨、曆數畧、字體畧、醫儒畧、算數畧、生知畧等節。

圖5 《附槎小說》第三目書影

其精慎如此防細故也前門四八一段約一百五六十而尺細作半  
月形橋廉聳立四柱高約二十而尺門外亦如作半月形懸出分  
柱對峙如學天八柱照立門正中望之則圓而遠通術者柱可免  
第三日  
巧會訂以西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起即南或泰十四  
年十月初四日也訂以一千九百二十三年正月會終但亦未示  
國家印定何日為止其諸國及本國 貴國巧項並引巧項諸  
官員御資均由 國家所受其脚資在附槎系承已共

圖6 《附槎小說》第七目書影

竟遠者之問應亦換躬而自愧若夫價他之弟益由於金形也  
相照嚴良雖非如冠帶微瑤易於文飾故耳  
第七日  
大日本國野巧堂在正中座後巧場之西邊其貨物則礦質石  
質雕刻木器磁器花竹金玉珊瑚尖蓋水晶無不備具均皆精  
好深觀美苑又有手車三輪一價五十九元一價六十九元一價七十九元其  
規式則異 貴國車式無異其里因共 貴國車未必已熟精  
伴而文飾適之國人服也利裝其餘西人同仍查之該國在俄國

資料來源：黎文啟，《附槎小說》，頁146。 資料來源：黎文啟，《附槎小說》，頁156。

「大皇宮」(中央展覽館)既是博覽會展館中的重心，也是黎文啟著  
意描寫的重點，我們亦能由此觀察他對法殖民者的態度。他如此寫到：

巧場正中座中間聳出一屋，自地面至巔，高約二十餘西尺，切  
石覆之，兩邊又下一層，別成一屋，引出二廈，又作堂隩，聳  
立如鼓桴，然亦切石覆之，高大依前。正中座上層兩邊窗砌，  
下面四圍鐵窗，列以水晶。堂中花砌，費鉅萬，極壯觀。中間  
排置金銀、珠玉、碑磔及雕刻木器、水晶諸項。兩邊排列象牙  
並諸雜貨、並槩劍古器，及貴國圖畫繡工(內有繡成雄雞二隻，置立  
鏡中，與生酷肖，最巧)，與北圻河內、海防、東半球諸地圖，凡金  
銀珠玉諸貴物，均造木函，高二三尺，蓋以水晶，俾便觀覽。  
內有金剛玉串作聯珠形，五色玲瓏，極悅目，價至四兆銀元。

又有海行江行大小火輪船諸畫圖，均已描成體樣，或造成木式，懸列座中，願買者，聽具粘單向座鬪價。<sup>30</sup>

黎文敵筆下的中央展覽館真如「皇宮」一般，從中可見其富麗堂皇與展品之盛。殖民者常透過宏偉壯麗的大型建築、以及金碧輝煌的精緻擺設，來樹立其統治權威，讓觀者產生諸如文中對建築「極壯觀」、對陳設「極悅目」的震撼，尤其是得到被殖民者的敬畏。有意思的是，黎文敵注意到兩隻栩栩如生的「雄雞」，這不禁讓人聯想到象徵法國精神之「高盧雄雞」的形象，正展示著這個民族與國家的壯盛驍勇、傲然俾倪的姿態。

黎文敵後來也參觀了法國及其殖民地展區、法屬印度支那展區、機械展覽館、新聞報刊展覽館等處，多有稱讚主辦單位設置用心、展品精妙之語。他更在法殖民政府提供官員士人往來博覽會的「腳費」(交通費)時，大力讚揚法殖民者，他說：「(法國)國家為吾民立富強之業，不惜鉅費如此，慈父之於眾子亦不過是，吾民其體此意而黽勉之。若謂此言為僕過譽，則巧場益利，在《附槎小說》，僕已具情推論，諸尊光顧，幸垂鑒焉。」<sup>31</sup>黎文敵提醒越人應體會法殖民政府耗費鉅資籌辦博覽會的用心。而他所體會到的「巧場益利」究竟是什麼？他曾在觀覽 1900 年法國巴黎博覽會之後，寫下〈賽巧場記〉，在文中分析舉辦博覽會的目的和意義，其云：

泰西賽巧，古者考工之遺意也。惟古人獨於技藝一事，又樸且略，反不若今人之萬物具備，又精且妙、美且詳，可以動民情，

<sup>30</sup> 黎文敵，《附槎小說》，頁 156-157。另外在〈紀安南河內賽會〉一文裡，也描寫到中央展覽館，其云：「會場居大道旁，面積橫直數百丈。大廈一所，橫長數十丈，工料費六十餘萬佛郎，雜列各地精華，如古玩字畫、雕繡細工等非目所常見。」見〈紀安南河內賽會〉，《選報》，第 48 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二十二日，「藝術小志」欄，頁 26，A 面。

<sup>31</sup> 黎文敵，《附槎小說》，頁 147。

可以興商務，并可以惠士林，可以尊國勢。然則賽巧其利益為何如耶？請述所見而略陳之，……商者可於此而通有無，學者可於此而窮格致，民情獨不於此而激動乎。民情激動而學業日開、商賈日廣、技藝日精，國勢於是乎蒸蒸日上。考工之闕，可不於此而增輯之歟？<sup>32</sup>

黎文敵認為博覽會的舉辦可以促進商業貿易發展、窮究科學格致之理、鼓動民情奮發學習、精進技藝，強化國家意識和尊嚴，使得國力逐漸提升。因此，博覽會正是國家邁向富強的標誌之一。黎文敵這樣的看法也延續至河內博覽會來，他曾有一段觀看印刷機印作報紙的紀錄，他說：

承貴官(筆者按：指法殖民政府官員)引看，現當印字，其印板以鐵為之，其印字以錫鑄之，其印紙與《同文日報》相似。雇工人將這紙置入機範，一轉即成，落出機外，一人收採最捷。問其工作，則謂一日可印二三千張。且如《同文日報》，國家不惜紙費、機費、工費，印出頒布諸轄下，並不取一文錢，非虛費也。吾人果能存心體認，則精神必能煥發，眼界必能豁開，豈惟五洲江山形勢，民情風俗、貨物土宜，如吾目見、如吾身歷。僕故曰：「《同文日報》，天上報章。」<sup>33</sup>

黎文敵隨著官員的引導，看到印刷機的構造、印紙的大小，以及印製的流程。迅捷的製程和巨大產能讓他驚嘆不已，自然也讓他想到透過同樣流程印刷而成的《同文日報》。他接著話鋒一轉，稱讚法殖民政府不惜

<sup>32</sup> 黎文敵，《附槎小說》，頁 26-27。

<sup>33</sup> 《同文日報》全稱為《大南同文日報》(*Đại Nam Đồng Văn Nhật Báo*)，發行時間為 1891 至 1907 年，為法方所資助的刊物，主要內容為宣傳法殖民政府政策與法令，以及政界動態。詳見 Huỳnh Văn Tông(黃文從), *Báo Chí Việt Nam từ Khởi Thủy đến 1945*(《自起始到 1945 年的越南報紙》), 77.

成本，不取分文，印製《同文日報》，免費發送各地。越南人若能體察法殖民者的用心和苦心，不僅可以了解各地方情勢與民情風俗，也能打開眼界，更能獲得精神上的提振充盈。他最後盛讚《同文日報》是來自上天上國的絕好刊物。黎文敵除了讚嘆技術的先進之外，更感佩法殖民者主動印製報刊、傳遞訊息的德澤。對於法殖民者來說，黎文敵不僅能體會主辦單位籌辦博覽會的種種用心，更能看出此會所帶來的重重效益，並宣揚此會的成功和法殖民政府的強盛，黎文敵的反應正好是他們所需要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黎文敵可說是河內博覽會的最佳代言人。

不過，這場河內博覽會是否有如官方所宣稱的如此完善，是否成功彰顯法殖民者在印度支那地區的治績和前進亞洲諸國的實力？在其他參觀者眼中，這場河內博覽會恐怕未如黎文敵所書寫的如此富麗成功。在〈海南賽會紀略〉一文曾提到印度支那總督杜美離職後，河內博覽會的籌備情形：

繼其任者為前駐京法使鮑渥，政策和平，於十月初旬始行抵任。都美既去，故賽會之舉，較原議大為減色。……會期本訂於十月初三日，因一切未備，故改至十月十七日始行開會，然諸事草率，至今開會以逾一月，各處工程尚有未完之處。<sup>34</sup>

因主事者換人，無法維持原本的規模和籌備進度，即便是延遲兩週開展，也因為許多工程尚未完成而顯得倉促草率。

前往參展的臺灣總督府代表柳本通義則指出法國館所展出的物品，與1900年巴黎博覽會相比，多為坊間廉價商品，而且雜亂無章。<sup>35</sup>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河內博覽會狀況(三)〉一文，亦批評法國身為主辦單位，卻看不出籌備的用心，其展示品為一般坊間之物，並非

34 〈海南賽會紀略〉，《萬國公報》，第169冊，1903年2月，頁27，A面。

35 柳本通義，〈總督府技師柳本通義提出河內博覽會二關スル出張復命書〉，頁9。亦可見於檜山幸夫，〈ハノイ博覽會と臺灣總督府〉，頁692。

如其所宣稱的那麼完善。作者進一步指摘杜美好大喜功，不斷興建勞民傷財但未必實用的大型建築，以及調高各種租稅關稅等種種錯誤的殖民政策，使被殖民者尚未得到保護，就已先受折磨。<sup>36</sup>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幾篇文章也有類似的看法：

千九百二年十一月，法領河內開設之博覽會，不過當時總督孺麥氏虛名心之發動，不足表白其殖民地之成功，固一時之定論也。吾人以為河內之博覽會，勿足效顰。<sup>37</sup>

東洋殖民地之博覽會，曩者法領于印度支那首都之河內，開殖民地博覽會。由來法領印度支那之經營，法國殖民地例多失敗。博覽會雖開，無有公示之價值，畢竟當時總督『渚麥』之廣告的吹聽的手段。<sup>38</sup>

因此，在日人眼裡，河內博覽會是一次準備不充分、殖民政策錯誤的失敗案例，最後成為日本舉辦博覽會的借鑑，也從中反映了日法雙方在東亞殖民的競爭態勢。他們將河內博覽會和印度支那殖民政策之失敗的矛頭，指向了總督杜美，而成為日本進行殖民統治的反面教材。中日兩國的參觀者都看出河內博覽會在富麗堂皇掩映之下的虛華，正潛藏著殖民治理的危機，<sup>39</sup>未必能昭示法殖民政府所宣示的成功的殖

36 詳見〈河內博覽會狀況(三)〉，《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2月10日，第2版。檜山幸夫，〈ハノイ博覽會と臺灣總督府〉，頁672-673。

37 〈臺灣博覽會希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7月3日，「論議」欄，第2版。

38 〈臺灣望開博覽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15日，「論議」欄，第2版。但作者也承認河內博覽會亦有其作用：「然內而啟發印度支那之民智，外而紹介印度支那之內容，其效實不鮮少也。」

39 以杜美所推動的大型建設為例，盧建銘指出這些大型建設相對地反映河內民生建設的缺乏，而且也耗盡了殖民政府未來可支配的預算，使得河內要等到1920年代後期才有大型建設的出現。詳見盧建銘，〈越南法屬時期河內的都市經營策略〉，頁83。

民統治，更別說法人有想要進軍東亞其他國家的野心，法殖民政府離其言說的富強狀態恐怕還有一段距離。

### 三、在地者與他者對法殖越南的重層觀察

筆者於前一節分析中、日、越三國參觀者對法國舉辦河內博覽會的觀察與感受，可見同一場博覽會在不同的觀看角度之下，甚至有著截然相反的認知與理解。此節則試圖探討在中、日、越三國參觀者對於博覽會「法國(殖民者)——越南(被殖民者)」關係中對越南的看法，尤其關注越南知識人黎文敵對於法殖民者及越南自身的重層態度，同時也兼及中日參觀者的觀察和書寫。我們可以從法越兩國對於「教化」的看法切入。

前文曾提及黎文敵所論之博覽會的利益，他認為除了可以展示舉辦國的國力之外，也可以教化民眾，使其學習更精湛的工業工藝技術水準，而達到開化的目的。在「法——越」兩國身處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狀態下，如何透過博覽會來開化被殖民者，更是法殖民者舉辦博覽會的重要關鍵。法屬印度支那總督杜美的繼任者保羅·博(Paul Beau, 1857-1927，任期 1902 年 10 月至 1908 年 2 月)曾在博覽會開幕式上提到：

見到東洋各地的農工產物聚集一堂後，不由得認為印度支那的領民們仍未開化，比起其他極早就引入歐西學藝，並致力發展產業的其他東洋先進國家人民要來得未成熟。不過最近幾年，他們也逐漸學習泰西的學術技藝，有比以往要進步了些。我相信在此次的博覽會中展示的中南半島製品，與過去相比有全新的面貌。<sup>40</sup>

<sup>40</sup> 原文詳見〈河內博覽會狀況(二)〉，《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2 月 7 日，第 2 版。筆者謹於正文中引用譯文，並說明原文出處，下文不一一註引原文內容，以省篇幅。

在殖民總督保羅·博的眼裡，印度支那人民屬於仍待開化的落後民族，與東亞其他國家相比，仍有一大段差距。另有一版本記錄保羅·博的致詞，則云印度支那之工藝，仍然停滯不前，未脫陳腐意味。<sup>41</sup>雖然印度支那人民尚未能與東亞這幾個國家的人民競爭，但他們可以在法國的殖民帶領之下，開始學習西方的工藝科技，並漸有進步，而河內博覽會正是他們展現產品新貌和技術進步的場合。

日人檜山幸夫在分析河內博覽會簡章時，提到在簡章裡設有「職能者」(Les Ouvriers)一項，主要是讓「亞洲人(安南人、中國人、日本人、菲律賓人、馬來人等)的工作與方式和歐洲人進行比較」，讓亞洲的職能者與機械在產品品質、作業方式和價格成本等方面相互競爭，來展現機械生產的實力，「如此一來，土著人也能透過學習法國的生產方式來更有力地提高生產力」。檜山氏認為博覽會最大的目的，正是讓「尚未成熟的民眾」即「安南人」文明化，並移植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給他們。<sup>42</sup>殖民帝國往往宣稱對於落後、未開化，或是文明遲到的被殖民者有教化開化的義務與任務，這樣的思維在河內博覽會這場工藝技術的對比中被清楚的展現出來。柳本通義也看出法殖民政府有這項意圖：

讓東洋人中頭腦最為單純幼稚，且落後世界文明許多的安南人，學習近代工商業發達的成效，以及展示二十世紀文明的產物，使其讚嘆、景仰母國宏大的恩惠。我們也可以說河內博覽會是法國於中南半島拓展領土的戰略手法之一。<sup>43</sup>

41 詳見〈法屬印度支那總督保羅在開幕式的致詞〉，收入日本貿易協會編，《千九百二年佛領東京河內府東洋農工技藝博覽會報告》，頁48-49。但保羅也提到印度支那仍保有某些稀有珍貴的技術家和職工，見頁49。

42 詳見檜山幸夫，〈ハノイ博覽會と臺灣總督府〉，頁677。原文則見柳本通義，〈總督府技師柳本通義提出河內博覽會二關スル出張復命書〉所附河內博覽會簡章，頁48。

43 柳本通義，〈總督府技師柳本通義提出河內博覽會二關スル出張復命書〉，

河內博覽會正好集合了最先進之殖民母國與最落後之被殖民者相關的展示品，兩相對比，可藉以誇耀母國的偉大，及其對被殖民者所帶來的教化，呈現出一種開化之望，進而讓越南人認同、學習法國科技與文明，甚至是對其感恩讚服。

在越南知識人黎文敵的書寫裡，他曾期待透過法人的教化來帶領越南人，提升越南自身的技藝水準與精神文明。例如，他描寫到越南所擁有的紡織技術，以及運用西方科技所能帶來的新影響，其云：

我南百工均已造作家居，在場內東邊，別房居住，軒外排列藝器，內有刻銀、織席、鑄銅、刻石、結羽扇、結雲藤諸工，人人皆執藝呈能，又有前美德道(由前屬河內省，茲始分為林多省)織繡工、織絹工。其織繡機十二杼三梭九屐，一人坐在機上依法改花，二人在下改織與織改，花席不異繡匹，則廣三尺二寸，花質藹然，但亦不甚精好，僅可賣諸富家列坐而已。使其仿效泰西機器，大清花樣，加工製造，則其化拙為巧，轉粗為精，想益何難之有。<sup>44</sup>

法殖民政府特別安排越南百工技師進駐場中，使越南手工業成為可以被「觀看」、被「展示」的對象。黎文敵隨著法殖民者所安排的視角，再次檢視自身民族工藝技術的發展。他以紡織工藝為例，描寫越南仍以人力操作紡織機(類似圖7所示)，而且還需要三人共同操作，所織出來的花席品質雖與繡匹相似，但並不精巧，無法成為高水準的織品。但黎文敵認為越南人若能學習西方使用紡織機械的技術，再加上中國大清流行的紋路花樣，便能提升織品的精緻度和價值。另外，他在博覽會的另一個展間看到：

貴國(筆者按：黎文敵以此語敬稱法國)姆婦教我南人習服女工，如針

頁7。亦可見於檜山幸夫，〈ハノイ博覽會と臺灣總督府〉，頁691。

<sup>44</sup> 黎文敵，《附槎小說》，頁164。

縫澣粉、搗治絲繭綿絮之類。其女工均自十一二歲至十六七歲，操作最勤，起居有法。藝成之後，不惟該等一生身榮，而後來教澤所及者遠，國家造成之益，又何如耶！<sup>45</sup>

越南人能在法人的指導之下，習得織造技術，不僅有助於提高學習者的社經地位，法人教化的恩澤及相關技術的擴散傳衍，更可能為國家的發展帶來影響。

圖7 越南傳統紡織方式



資料來源：Henri Oger, *Kỹ Thuật của Người An Nam*, edited by Philippe Le Failler and Olivier Tessier, translated by Trần Đình Bình and Sheppard Ferguson, 367.

說明：亨利·奧格爾(Henri Oger, 1885-1936?)於1908年雇用畫師記錄安南人之生活、習俗、產業、技藝與器物等面向，於1909年編印出版，但流通量相當稀少。此書後由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菲利普勒·費勒(Philippe Le Failler)、奧立維·泰瑟(Olivier Tessier)兩位學者重新編輯，並由陳廷平(Trần Đình Bình)譯為越文，由希巴德·弗格森(Sheppard Ferguson)譯為英文，於2009年由越南河內地球出版社(Nhà xuất bản Thế Giới)出版。本圖即據此版本。感謝審查人提醒此書流傳狀態。

<sup>45</sup> 黎文啟，《附槎小說》，頁160-161。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黎文敵對於法殖民者的博覽會書寫，頗多熱烈擁護、歌頌宣揚的內容，也可以見到他對於法人開化越南及越南人的使命多所期待。只不過，黎文敵這種被視為親法／傾法的行為，在中國人眼裡看來卻是一種亡國之態，例如曾有一篇〈記客語越南事〉透過主客問答方式，針對越南人亡國發表看法。文中之「客」即為當時代表北京工藝局前往河內參展的黃中慧(字秀伯)，他觀察到此次河內博覽會的越南民眾，他說：

異哉！越南之人之亡國而樂也。甲申戰罷，吾中國人皆曰：「越南亡矣。」既入境，察其政，吾亦曰：「越南誠亡。」吾嘗構擬亡國之慘度，越南人士必有無限悲感蒼涼之意。既吾接其人，神閑而色愉，弔其所遇，茫然若不知所對。<sup>46</sup>

自 1884 年中法戰爭以來，無論是中國內部的看法，或是黃中慧在實際接觸後的體會，都認為越南已走向亡國的境地，越南士人也應當感到特別的淒楚才是，但黃中慧發現他所接觸的越南人卻無亡國悲苦之感。他進一步追問越南士人，發現越南原有的政治體制，如君主、各式官職，以及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都獲得保留，「若是乎，規制整暇，曾謂不國者而能之也，意者越南其未亡耶！」<sup>47</sup>但若說越南未亡，卻又不盡然，因為任何的決策都由法國總督或法國官員決定。法越官員雖品秩相等，但以法官為大。再加上法人所立賦稅苛刻繁重，又多有欺凌越民之事，「積威所在，莫敢陳訴，吾未見其官之能治事也，然

46 〈記客語越南事〉，《外交報》，第 38 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二月二十五日，「論說」欄，頁 2，A-B 面，收入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清末)時事采新彙選》，頁 2420。

47 〈記客語越南事〉，《外交報》，第 38 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二月二十五日，「論說」欄，頁 2，A 面。

則越南其真亡矣！」<sup>48</sup>那麼真已亡國的越南人，為何在法國殖民之下能「神閑色愉」呢？黃中慧進一步分析，法國外交勢力強大，法殖民政府亦帶來新興的鐵路、都市規劃、大型建築，將河內建設為東方的巴黎。「既無內憂外患之逼，又為之興未有之利。」<sup>49</sup>各色人等都能找到出路，尋得自身利益，如越南君臣便坐享其成，又如讀書之士仍以獵取科名為榮，他最後說：「吾未見越南人之一日不在樂境也。」<sup>50</sup>文中未署名的作者在聽聞黃中慧之語後，則有以下感嘆：

嗚呼！吾不知越南之人，其願無甲申之役而憂歟；抑願有甲申之役而樂也。以今例昔，其上下荒嬉，相率媚外，延頸以盼法人之來者，蓋不知幾時矣。然則越南之亡，豈法人亡之哉？越南人之欲樂其樂而自亡也。<sup>51</sup>

該文作者最後從越南上下甘受殖民、相率媚外、不思反省的態度，來批評越南並非亡國於法人之手，而是亡於越南人自身甘願被法國殖民，以享受強權統治下的利益，卻未能抵抗的情狀。

對於法國殖民之德的歌頌讚揚，更有甚者如作者署名「奴痛」的〈河內博覽會廣告文〉這篇文章，奴痛在文中引錄了河內華僑「廣東幫長生源昌號劉頌三」為宣傳河內博覽會所刊登的廣告文。

蓋聞賽會之設，伊古以來，何國蔑有，未有如法人得越南東京之盛者也。十餘年時何世盛，十三省物阜民康，茲屆賽會之期，訂

48 〈記客語越南事〉，《外交報》，第38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二月二十五日，「論說」欄，頁2，B面。

49 〈記客語越南事〉，《外交報》，第38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二月二十五日，「論說」欄，頁2，B面。

50 〈記客語越南事〉，《外交報》，第38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二月二十五日，「論說」欄，頁2，B面。

51 〈記客語越南事〉，《外交報》，第38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二月二十五日，「論說」欄，頁2，B面。

期于西一千九百零二年十一月起，至西一千九百零三年正月止，試及景而約略陳之。夫古今至寶，中外奇珍，法人不惜重資，務期富有，不嫌事擾，務盡蒐羅。動則有珍禽奇獸，植則有奇花異草，物以造而就者，鬼斧神工；物以化而成者，天造地設，形形色色，愈出愈新，怪怪奇奇，彌精彌妙。幾多黛綠粉紅，無限珠明玉美，九十日珍奇，燦然羅列，萬千年至寶，煥乎直陳。爽心奪目，悅性移情，不居然大觀也哉？其次傑閣凌雲，危樓摘星，欄杆馥郁。臺榭崢嶸，酒肆別中西；馨香至味，街衢分左右。樹木交輝，堂名禮拜，嵯峨則天日齊高；園號皇家，憩遊則軍民共樂。道路平康，南圻北圻皆通達；水鏡明媚，劍湖西湖樂溯洄。任重致遠，電車火車顯其奇；就熟駕輕，手車腳車呈其異。虎嘯龍吟，咸欽京戲，高山流水，共唱梨園。電戲畫戲齊鬥巧，童男童女共爭妍。毯運輕氣，空中直上界三千；鐵鑄成橋，水面橫浮虹萬丈。遊目騁懷，極視聽之娛；仰觀俯察，窮物類之華。遊藝者駕梯航而至，博物者越關山而來。商賈雄豪，如雲如雨；歐亞士官，以遨以遊。非通都大邑，勝地名區，有此奇觀哉？爰呈小引，貽哂大方。<sup>52</sup>

該則廣告文濃墨重彩地誇耀法人籌辦博覽會時的用心，進而創造出壯麗的盛世奇景，以及隨之而來的賞心悅目、聲色俱佳、極盡歡娛的遊觀體驗。這位廣東幫幫長劉頌三對於法殖民政府舉辦博覽會之成效是高聲讚揚、極力呼應，但「奴痛」在看完這份廣告之後，卻是嚴厲批評云：

為此文者，其人素主尊王主義，喜作頌聖文章。凡坐堂皇，執刀鋸鼎鑊以臨之者，彼必乎為我聖朝、我皇上，無論其血統之同異、

<sup>52</sup> 劉頌三，生卒年及生平事蹟不詳。引自奴痛，〈河內博覽會廣告文〉，頁108-109。

膚色之黃白。但其手段強硬，慘毒可畏，皆當屈服其下，獻媚賣淫以作忠臣孝子，斷不敢稍懷誹謗，自陷於大逆不道。舉其臣服於異族，歌功頌德之祖傳，轉而代他人以媚異種，不幸亞洲全土，多產此一種萬劫不復之奴隸。國亡家破，依然自慶昇平；賸水殘山，不問誰家管領。今日中國人見安南人，滿口稱揚不置；他時安南人對中國人，必自幸其得佳主人翁，使彼邦變為文明之域，而誇耀於中國人者，吾安得翻太平之水，而淨洗其穢惡也。<sup>53</sup>

作者以「奴痛」為名，或許是指身為亡國奴隸之痛，此痛不可忘懷，用以警醒自我與世人。奴痛強烈抨擊刊登此廣告者，其對新的「佳主人翁」的卑躬屈膝、四處誇耀，顯示其為毫無國家尊嚴觀念之人，即便是國破家亡、殘山剩水，也不在意。更有甚者，中國人看到越南受到法國殖民後的改變，竟然也羨慕起來。但即便有一天，越南能因西方的殖民統治而逐步轉變國家體制，成為新的文明之地。這對奴痛來說，也不值得可喜，因為文明與進步的追求若是要以喪失國家的尊嚴、自身的獨立來交換，並成為奴隸的話，他寧願不要，甚至還要洗淨政治立場投機，傾向搖擺不定之人的穢惡。未有亡國之感，不知反省亡國之痛，恐怕是奴痛眼中的越南人形象。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中國人為何對於越南人的亡國之態有如此嚴厲的道德批判，甚至批評起越南人的民族性，例如就有中國人因在博覽會裡，未見到由越南人創辦的報刊，便指責其「頑固性成，不願輸入文明。」<sup>54</sup>對此，李丹在探討河內博覽會的時候發現：

前往河內博覽會的清朝官吏更多的是帶著一種政治自覺去觀察，從國家的層面去思考和理解。如前文提及的工藝局總理黃

<sup>53</sup> 奴痛，〈河內博覽會廣告文〉，頁 109-110。

<sup>54</sup> 〈河內賽會日記摘錄〉，《大公報》，1903 年 4 月 12 日，「專件」欄，第 1 版。

中慧，對越人亡國而樂曾有一評論，正反映了從政治主權的角度去觀察的這種自覺。<sup>55</sup>

可惜李丹並未就此多做討論。所謂「政治主權」即有可能是中國喪失了原先對於越南的宗主國地位，在情感上無法接受，而對接替中國位置的法殖民政府及越南人給予強烈的批評。<sup>56</sup>這些中國參觀者認為越南一旦失去原先中國的保護，其國便應天崩地裂般的淪亡瓦解，但實際狀態並非如此。因此，當他們無法理解其認知(或想像)和越南現實之間的差距或鴻溝時，便直斥越南人未有亡國之痛，只知相率媚外。出自本位主義的思考，以及與法國競爭的國際關係，讓他們無法給予現實客觀的評價，反而在博物會這面大鏡子裡映照出自身失去越南的焦慮。

但實際上，黎文敵對於越南被殖民的現實處境，是有清楚的認識的，並非渾然不覺的亡國奴。如前文所述，他在《附槎小說》裡關於河內博覽會的書寫，頗多熱烈支持歌頌法殖民者的內容，但這不代表他對於自身被殖民的處境毫無感受，意義往往在比較差異之中豁顯，例如他曾參觀原住民以及他們的聚落：

巧場東邊右廡後，造設家居一行，共八九屋，如市寮，然益以蒨葉。又有五六家造成圓勢，有濶七八尺者，有濶十二三尺者，亦以蒨葉覆之。屋上尖出如牛車棚，此蓋該等在國所居家式，我國家依樣造之，令他居之，使吾見之，亦廣見之一意也。其

<sup>55</sup> 李丹，〈1902年河內博覽會述略〉，頁161-162。李丹在此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看視角，不過他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僅止於此，之後未再就北京工藝局經理黃中慧之〈記客語越南事〉的內容多做討論。

<sup>56</sup> 承蒙審查人提醒應從中法越三國關係在十九世紀中期之後的演變狀態，來思考中國參觀者對越南亡國的批評，筆者謹致謝忱。關於法國對於越南的逐步征服，以及中國與法國簽訂各項協約，放棄與越南之藩屬關係的過程，可參見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her Goscha)著，譚天譯，《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頁117-124。

居人均係黑奴，鬚髮螺拳，並不見行何技藝，訪聞該等乃是南美洲，及亞非理駕洲土人。彼土人才淺智愚，別無技巧，惟以見聞一事，猶且不辭勞苦，梯航萬里而來。我南人則通慧多才，兼以國家保護引誘，不必風塵遠涉，而見聞可廣、智識可開，奈何通好來茲四五十年，而仍如一日，徒令遺笑他邦，甚至渺[藐]視我南人，日求智識卓遠，益亦寥寥無幾，悲夫！<sup>57</sup>

在黎文敵的描寫之下，這些來自於南美洲和非洲的原住民是以一種「人種展示」的方式，<sup>58</sup>即將「數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社會群體，連同他們的居住環境，一併移植到博覽會會場」，再現「未開化社會」的奇觀。<sup>59</sup>因此，這些原住民只要在聚落裡生活就好，不必具備任何技能，本身就能顯示出一種「未開化社會」的特殊景觀。黎文敵也看到了這個奇觀，並指出其落後的發展狀況，但他轉念一想：這些土著雖然才智不高，但為了博覽會，為了開拓見聞，仍不遠千里而來，以追尋某種意義或目的的完成。<sup>60</sup>相較之下，越南人才智資質較高，又不

<sup>57</sup> 黎文敵，《附槎小說》，頁166-167。

<sup>58</sup> 據《參訪遠東河內博覽會[1902-1903]——總報告》，此次並無南美洲原住民參展，南美洲多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若再就展區位置來看，有設置原住民聚落的「巧場東邊右廡後」，是寮國村、菲律賓村，以及尼格利陀人村。尼格利陀人外在特徵是皮膚為暗褐色至黑色，毛髮短捲，亦與黎文敵描述特徵相符合。關於河內博覽會尼格利陀展區的照片，因版權問題，此處無法顯示，詳見「河內生活·休閒娛樂」(Hanoi la Vie · Leisure)網站，該網站由法國全國遺產聯合會(Fédération Nationale du Patrimoine, 簡稱 FNP)提供許多河內歷史照片，坊間網站關於河內博覽會的圖片來源大多來自於此，網址：[http://www.hanoilavie.com/index.php?lang=eng&action=voir\\_galerie&rep=Loisirs](http://www.hanoilavie.com/index.php?lang=eng&action=voir_galerie&rep=Loisirs), accessed December 5, 2017. 在此網站內也有不少1902年河內博覽會的圖像，多翻攝自當時的明信片，有興趣之讀者亦可參看。

<sup>59</sup>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等譯，《博覽會的政治學》，頁184。

<sup>60</sup> 這些原住民也有可能是被迫參加，未必有主動性，但就黎文敵的心態上來看，他認為他們已經克服空間的難題，至少已有所行動或完成某個目的。

必將心力耗費在空間移動，自然更容易增長智識、開拓視野，而有一番成果。那麼為何在法殖民政府多年「保護」之下，智識文明至今仍無多少進展，產業也沒有獲得提升或發展，甚至連越南人本身也成為被觀賞的「奇觀」之一，<sup>61</sup>而讓國際訕笑藐視？是民族性使然，還是殖民政策導致，抑或是其他原因致之，黎文啟並未繼續追問下去。而在《附槎小說》裡有讓他頗感不悅的另一個例子：

內有一畫圖，長潤約西一尺五六寸，描一側卧女人形，如我南人，約可十七八歲，全身並露，遠望疑真。價錢五六百銀元，觀者莫不詫異。古人所謂：「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不圖今於畫筆，又得見之，中藏禍孽，而外飭威儀，參觀退省之間，應亦撫躬而自愧。<sup>62</sup>

黎文啟於法國展區突然見到以越南人形象為範型所繪製的裸女像，甚感詫異。法殖民者竟大膽地公開展示越南女性的身體，將之暴露在男性的凝視之下。對於黎文啟來說，身體具有政治上的隱喻意義，不僅意味著殖民者可以隨意地想像和侵犯越南女性，也暗示著殖民者對於越南這個國家的宰制。他後來引用了《三國演義》彌衡(173-198)露體責罵曹操(155-220)的話語，<sup>63</sup>暗指法殖民對越南人的輕賤。離開畫室後的

<sup>61</sup> 除了展演越南人的傳統工藝之外，黎文啟曾寫到：「又有南圻演巧一座，造作我南官，朝服列坐，冠帶儼然。」黎文啟，《附槎小說》，頁 151-152。就當時留存的照片來看，應該是主辦單位依照阮朝官員服秩，製作木偶像或蠟像供人觀賞，越南人在此也成為他人觀賞獵奇的對象。但黎文啟並沒有寫下他看到此場景的感受。關於河內博覽會安南人展區及阮朝官員人像照片，因版權問題，此處無法顯示，詳見「河內生活·休閒娛樂」網站，[http://www.hanoilavie.com/index.php?lang=eng&action=voir\\_gallerie&rep=Loisirs](http://www.hanoilavie.com/index.php?lang=eng&action=voir_gallerie&rep=Loisirs), accessed August 3, 2018.

<sup>62</sup> 黎文啟，《附槎小說》，頁 155-156。

<sup>63</sup> 陳曦鍾、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上冊，頁 284-286。

撫躬自愧，是黎文敵對自身國家、民族最深的探問，整個國家民族為何竟如此受制於人，惆悵悲涼的亡國之感不言可喻。黎文敵的這些書寫有別於他先前對殖民者的熱烈擁抱，讓人明顯感受到他對於殖民處境的深層焦慮和關懷，及其觀察與書寫背後更複雜多元的情感意圖。

經由上述討論，我們可以見到黎文敵對於法殖民者的重層態度，一方面歌頌法殖民者，並期待法殖民者能提升越南人的智識與能力，使其邁向文明開化的境地。但他一方面對於法國殖民越南的現實亦有清醒的認識和深切的關懷，自我與他者的分別仍然相當明確。這不禁令人質疑他的立場是否模稜兩可、搖擺不定？還是他另有盤算？面對法國殖民越南的處境，有人堅定抗法，如潘廷逢(Phan Đình Phùng, 1847-1896)，亦有人選擇與法合作，如潘周楨(Phan Châu Trinh, 1872-1926)主張與法國合作以重建越南，更有人隨著現實的處境，在抗法與親法所形成裡的光譜裡移動。即便是反法最力的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 1868-1940)也曾於1918年提出「法越提攜合作」的口號，造成革命陣營的路線爭議。<sup>64</sup>可見這些士人對於越南遭受殖民的處境均有體認，雖有救國之念，但彼此在行動上的手段和步驟千差萬別。高夏(Christopher Goscha)就曾觀察到「殖民地合作是一種複雜又非常敏感的現象」，造成被征服者與占領當局合作的原因非常多，而且合作及與之對抗的策略隨著現實處境也不斷地在變動，並非每個親法者或為法殖民工作者「在一開始都是叛徒」。<sup>65</sup>這給我們觀察黎文敵新的理解方式，黎文敵的確向殖民者靠

<sup>64</sup> 關於潘佩珠與潘佩楨救國路線的差異，以及潘佩珠提出「法越提攜合作」所造成的後果，可參見羅景文，〈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之研究〉，頁54-56、142-143。以及高夏著，譚天譯，《越南》，頁155-172、177。高夏關於潘廷逢抗法的討論，詳見頁148-150。

<sup>65</sup> 詳見高夏著，譚天譯，《越南》，頁140-141，引文見頁140。另外，高夏也觀察到法殖民者一方面想要削弱皇室，一方面卻又想利用皇室來拉攏愛國精英。這樣的層層態度亦使得彼此的合作關係更加複雜，見頁147。

攏，但其對越南國家處境的焦慮擔憂，並不遜於反法殖民運動者，而且他也期待越南人透過與法國人的合作，法人給予指導，來提升越南民族國家邁向現代化的意識和能力。當然，他那的種種與法殖民者拉開距離，展現主體性的省思，也提醒了越南人並不能將所有的「開化之望」都寄托在法國人手中，而是要強化自我能力。因此，我們不能用傳統的「堅決抗法」、「接受馴化」這類二元觀點來看待這一位越南知識人，而是看到他在配合殖民者的過程，換取民族得以喘息發展之空間的努力。

#### 四、中日兩國的展示內容及相關書寫

除了法越關係之外，河內博覽會另一個可供觀察的重點，即是中日兩國的參展特色，以及中、日、越三國參觀者如何在這場博覽會看待這些人。先從中國方面來看，此次參展對中國來說，有相當特殊的意義。根據報載，中國此次參展的創舉為北京工藝局帶領工匠前往會場實作，而且參展物品素質嚴整，經過博覽會競賽評選，更榮獲多個獎項：

法文報云：「河內開會以來，珍寶羅列，為東方巨觀，各國工藝亦多在場內競奇鬥巧。中國工藝與會者為北京景泰藍、福州雕漆；日本來者有顧繡、畫瓷，亦有景泰藍。其餘各國有油畫、理絲、烟捲等藝，均各帶工人在場內開工，現經各西人評定，推中國第一，以中國所有貨物既多且美、工堅料實也」云云。<sup>66</sup>

<sup>66</sup> 〈論中國安南賽會事績前稿〉，《大公報》，1903年1月21日，「論說」欄，第2版。在未著撰者之〈河內賽會日記摘錄〉曾描述中國展品陳設方式的文字，可與此網站的中國展區圖相互參看，[http://www.hanoilavie.com/index.php?lang=eng&action=voir\\_photo&rep=Evenements&photo=1902%20Exp](http://www.hanoilavie.com/index.php?lang=eng&action=voir_photo&rep=Evenements&photo=1902%20Exp)

各國赴會之物，以中國為第一，日本次之，其餘如暹羅、緬甸、小呂宋等國雖皆有專所，而氣脈究小，殊不足觀。<sup>67</sup>

此次安南河內賽會以中國貨為上，已散見各報，而尤以北京工藝局之景泰藍貨為最，聞此次可得超等文憑云。按賽會章程，一等貨給超等文憑，二等給金牌，三等銀牌，四等銅牌，五等尋常文憑。不特為該局之光，亦中國商務將興之大關鍵也。<sup>68</sup>

根據李丹的統計，中國此次參展一共獲得 6 個超級文憑獎(Grand Prix)、8 個金獎、8 個銀獎、2 個銅獎，獲獎頗豐。<sup>69</sup>其中北京工藝局之景泰藍、金銀器獲得了超級文憑獎，大理石器和棉織品則獲得銀獎，為中國獲獎最多的單位，不僅打響該局名號，也大大擴展了該局的事業版圖，可謂名利雙收。<sup>70</sup>而北京工藝局在參展前曾提出「講求工藝、提倡商務、暢銷[銷]土貨、挽回利權」之目標，<sup>71</sup>也因獲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和呼應。對中國來說，此次參展不僅僅是「中國商務將興之大關鍵」，亦是預示「中國工藝學之蒸蒸日上」的轉捩點，<sup>72</sup>這對剛經歷八國聯軍之役(1900-1901)的中國來說，能獲得外國獎項的肯定，無

---

osition%20Pavillon%20Chine.jpg, accessed November 27, 2017.

67 〈海南賽會紀略〉，《萬國公報》，第 169 冊，1903 年 2 月，頁 60-61。

68 〈時事要聞〉，《大公報》，1903 年 1 月 19 日，「時事要聞」欄，第 2 版。

69 李丹，〈1902 年河內博覽會述略〉，頁 164-165。

70 在〈紀北京工藝局〉這篇報導裡，提到該局在河內博覽會之後所獲得的關注和實際利益，如訂貨者增加、入股北京工藝局者增多、股東所得股利提高，以及預計在上海開設分局。在河內博覽會之後，北京工藝局也前往日本參加博覽會。詳見未著撰者，〈紀北京工藝局〉，《選報》，第 48 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二十二日，頁 28，B 面。

71 語出北京工藝局，〈北京工藝局經理河內赴會啟〉，1902 年 8 月 23 日，收入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清末)時事采新彙選》，頁 1259。

72 〈紀北京工藝局〉，《選報》，第 48 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二十二日，頁 28，B 面。

疑有鼓舞民族自信、激勵工商發展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日本此次亦有景泰藍參展和工匠隨行赴會，因此便有報導關注中日兩國景泰藍的優劣情形：

日本出品所內以景泰藍為大宗，窯磁次之。其景泰藍、磁器皆時下物，製繪極工、取價極昂，其畫別具特質，每失之鑿。漢畫多逸致，而理不明，無所謂陰陽遠近、大小長短，不中規矩，狀物虎犬鵠鶩莫辨。日人昔愛漢畫，倭派淵源漢派，略為纖巧。維新後取則歐美，非常進步，然究不能擺脫舊習，以為能於工密中見筆意，磁器、景泰藍繪工兼有漢洋風味，非中國之所及，式樣方圓曲折，畫變從前鈍相。<sup>73</sup>

(景泰藍)日本師中國為之，政府獎勸，學問日進，繪畫設色較佳，即製磁油亦較鮮潔。每鑄銀為器皿之胚，其磁質顏料燒好時，光若無物，清可見底，比中國尤奪目，惟過稚氣，質料復脆薄，值較中國高，聲價總不能駕其上。黃氏悉心改良，恐非日本所易及。此次中國、日本皆攜帶工匠，於廊前小工場製造，任人縱覽，層次曲折，詳示遊人，無不驚用心之精，嘆成器之不易。<sup>74</sup>

作者認為日本景泰藍製程雖師法中國，卻又能取徑歐美工法，使作品融合漢洋風格，可謂後出轉精，此為中國所不及，展現出有別於中國景泰藍的特色，在市場價格上亦高於中國製品。不過，中國景泰藍還是保有長久以來累積的聲譽，在面對日本的競爭，北京工藝局的經理

<sup>73</sup> 〈紀安南河內賽會〉，《選報》，第48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二十二日，「藝術小志」欄，頁27，A面。

<sup>74</sup> 〈紀安南河內賽會〉，《選報》，第48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二十二日，「藝術小志」欄，頁27，B面、頁28，A面。若從作者所描述的這兩段內容來看，如「光若無物，清可見底，比中國尤奪目」、「質地脆薄」等語，此處的日本景泰藍應為「七寶燒」，其與景泰藍的工法並不相同。兩者差別詳見趙汝珍，《古玩指南》，頁299。

黃中慧則用心改善製程和工法，此亦有日本所不易達到的優勢，作者比較持平地分析中日兩國景泰藍各擅勝場的特色。但在另一篇同樣是觀察到中日兩國製作、展示景泰藍的〈海南賽會紀略〉裡，則相當強調中國取勝日本的情形：

中國工匠赴會，以北京工藝局為創舉。日本此次亦有景泰藍工人在會場製造，其工場與工藝局相對。日本藍器花片向稱精美，工藝局新式甚多，足與相敵，工料堅固，自始至終，凡經十六次手工。日本製法甚為簡易，殊不足觀。中日兩工場相去咫尺，西人遊者一一研究，皆推中國藍器足以經久，故每製一器，未及竣工，即為西人定去，工戰制勝，此其嚆矢也。<sup>75</sup>

報導指出中國北京工藝局所製之景泰藍以樣式多元、做工繁複取勝。<sup>76</sup>而作者更著眼於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則是「工戰制勝」，就是中國的工藝技術已不僅能與列強比肩，甚至還能迎頭趕上，一舉登上世界舞臺。勝過日本景泰藍，即象徵著過去在列強前低頭的中國，也能振興工藝而臻於富強，一掃前恥。而且這個得來不易的榮譽，是經過官方認證、西人肯定的。中國此次積極參展，亦有在中法越三國外交關係發生轉變，即中國被迫放棄與越南的宗藩關係，讓法國殖民越南之後，而特意在法國及越南面前，展現工藝實力的意義。也因為這一層外交關係，中國相關報導對於中方表現多予以讚揚，對於法人越人則頗有貶抑，或斥越人為亡國奴(如前文所引「奴痛」所撰的文章)，或批

<sup>75</sup> 〈海南賽會紀略〉，《萬國公報》，第169冊，1903年2月，頁61。

<sup>76</sup> 關於北京工藝局製作景泰藍的工序，詳見〈北京工藝商局景泰藍造法〉，《大公報》，1903年6月22日，「錄件」欄，第3版。附帶一提的是，日本七寶燒的工序亦相當繁複，可多達三十幾道，主要工序有七道：制胎、掐絲、燒焊、點釉、燒釉、打磨、鍍光。詳見不著撰者，〈七寶燒——日本的「景泰藍」〉，<https://read01.com/6GGkA7.html>，擷取日期：2017年12月1日。

評法人籌辦之草率，指陳其錯誤的殖民政策，同時也不忘提醒讀者法殖民於東南亞劍指中國廣東、廣西、雲南三省的野心。<sup>77</sup>

不過，相比之下，日本及越南參觀者對於中國展品的評論，可能會讓特意展現工藝水準的中國人相當不悅。日本貿易協會的報告書直言：「從紡織物、象牙、漆器、刺繡開始，到唐木手工藝等展示品，並沒有什麼可看之處。」<sup>78</sup>顯然中國各項參展品並未引起他們的興趣，或是說中國展品並非日本參展團在乎或關心的焦點，隱隱有不把中國視為對手的意味。柳本通義也講得坦白：

支那館的展示品為陶器(花瓶類)、黑檀製品(椅子等)、臘石製品(飾品)、織物以及刺繡。其中不乏原料高檔，但卻只做為玩賞物的展示品，其設計之繁瑣過剩，反而顯得幼稚且拙劣，無法發揮光彩。陶器也大都粗製濫造，像是穢物一般，不堪入目。想必前來參觀的歐洲人只會對這些展示品感到怪異，而不會有為之駐足的人。<sup>79</sup>

柳本氏批評中國展品使用了高檔原料卻加以繁複的裝飾，與前文《臺灣日日新報》對中國展品的評價相似，而陶器更是被評為粗製濫造。不知何故，他並未明確提及中國人引以為傲的景泰藍，卻提到日本七寶燒。中國景泰藍多有花瓶型制，然非陶器之屬，不知道柳本氏所指的中國陶器有沒有包含景泰藍？無論如何，筆者相信他應該是有見到這類中國強打促銷、著意宣傳的明星展品。我們可以看到日人對於處處與其競爭

77 詳見〈紀安南河內賽會〉，《選報》，第48期，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二十二日，「藝術小志」欄，頁26，A面。

78 日本貿易協會編，《千九百二年佛領東京河內府東洋農工技藝博覽會報告》，頁46。

79 柳本通義，〈總督府技師柳本通義提出河內博覽會二關スル出張復命書〉，頁10。亦可見於檜山幸夫，〈ハノイ博覽會と臺灣總督府〉，頁692。

之中國展品的評價普遍不高，甚至是有意無意忽視。

越南知識人黎文敵認為中國此次參展品手藝較突出者，有磁(盜)器與象牙雕刻，而其所搭建的木樓則與越南民居樣式相似，其手藝與越南不相上下，並沒有帶給他太大的驚喜，反而認為中國這些工藝品的製造技術，遠遠不及法國、日本兩國在技術上的進步，連帶地也讓他論及兩國在民族性上的相似之處，國民都安於舊習、格於成例，也就較少突破現狀了。他說：

大清貨物前此多與我南互相貿易，吾人皆已見之，不須贅敘。至於繡畫嵌漆、金銀硃礦，雖無不備，而手藝則以磁器為上，雕刻次之，如堂中排列有銀墀二口，高圓約八九寸，四周花樣獸形，雕刻極精；又有象牙長六尺，腰圓四寸，牙端與牙根銀色，花結全身，刻三國事跡，重穿二層；又有三木樓，高約七南尺，二層，廣六尺，上下與我南冥家一般，雕刻四靈、四季，油漆頗工，但與我南手藝不甚勝遜。視之泰西、日本全用汽機，瞠乎後矣。其國人結髮闊袖，不忘舊俗，亦如我南人安故意，常構之於前人成法焉耳。<sup>80</sup>

在黎文敵眼中，越南與中國這兩個工藝水準與國民性差不多的國家，大概屬於同一級別。換言之，中國並不比淪為殖民地的越南進步多少。值得留意的是，與中國參展品相較，黎文敵對於日本展品則有較高的評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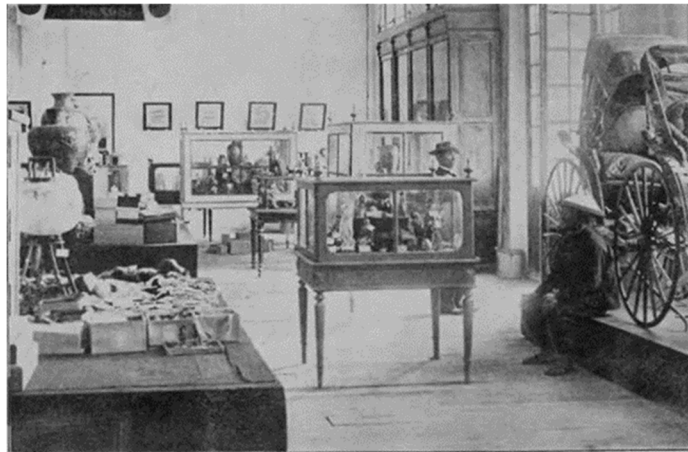
大日本國貯巧堂在正中座後，巧場之西邊。其貨物則礦質石質、雕刻木器、磁器花竹、金玉錦繡、破畫水晶，無不備具，均皆精好，濃豔美觀。又有手車三輪，一價五十元，一價六十元，一價七十元，其規式則與貴國(筆者按：作者以此語敬稱法國)車式無異，其堅固與貴國車未必已能彷彿，而文飭過之。國人服色剝

<sup>80</sup> 黎文敵，《附槎小說》，頁157-158。

髮，與泰西人同。仍查之，該國在我國東北隅，與我相去不過二、三千海里，前此風俗不甚懸殊。數十年間，倣效泰西，而技藝日精、富強已效，窮則變變則通。昔吾耳聞，今吾目見，吾人其見賢而思齊可也。<sup>81</sup>

在黎文敵的眼中，日本參展物品質精美，其美觀程度令人難忘。但他也不忘將其與法國展品相較，以人力手拉車(或稱東洋車、黃包車)為例，他認為日本人力車的樣式與法國無異，但其實用性未必能比法國所產的堅固耐久，反而是外在裝飾過於繁複。我們不難從他的比較中感受到日法兩國些許競爭的意味，在他的心目中形成「法——日——中越」的國力序階，也折映出他們眼中某些國家的富強之業、殖民之法。

圖8 含有人力車之日本展覽館內一景



資料來源：日本貿易協會編，《千九百二年佛領東京河內府東洋農工技藝博覽會報告》，書前附圖，無頁碼。

<sup>81</sup> 黎文敵，《附槎小說》，頁 156-157。

黎文啟接著提到日本帝國數十年來的發展，他認為原本與越南風俗相差不大的日本，竟然在這數十年中幡然改易，決意西化，工藝技術日益精進，明顯看到日本逐漸邁向富強，目睹其盛更覺真實，可成為越南學習的榜樣。有意思的是，越南此時已被具有文明進步意義的「泰西」法國殖民統治將近二十年(筆者按：1858年侵略越南，1862年獲得南圻地區，1884年佔領全境)。照理來說，越南有更直接接近並學習泰西文明的機會，卻欲效法日本，作者此語不禁令人玩味。或許我們可以解讀為他在期待法人提攜之餘，更欲警醒越人見賢思齊、自立精進的重要，日人既然能變通自強，那麼越南應該也可以努力創造出一個光明的未來。

相較於黎文啟對日本參展品不錯的評價，日本方面的評論就顯得相當的嚴厲，無論是對自身還是對他國的參展品。前文已述及日方批評主辦單位籌備草率，對於中國展品也未有太多關注，甚至是輕忽，此不再贅述，值得對照的是日方對於自身參展品的態度。臺灣總督府代表柳本通義提到日本此次參展的物品主要有陶瓷器、七寶燒、唐銅製玩賞物及玩具，還有準備令法國人感興趣的美術品，因此每日均有達到預設的銷售額度。<sup>82</sup>但他也批評了日本展品的缺點：

日本的工藝品只在外觀上下工夫，對於品質的把關與實用性上卻不甚在意。由此可言，這些工藝品乍看之下很漂亮，但缺乏實用性。再者，日本於設計上僅注重在美觀，雖然可勉強稱其是為了保有高潔的格調，但不過是一玩物爾爾。日本製品僅僅是讓觀賞者讚嘆的玩物。換句話說，日本製物於社會實用性上並未達到標準。<sup>83</sup>

82 參展品項目錄詳見「出品表」，收入日本貿易協會編，《千九百二年佛領東京河內府東洋農工技藝博覽會報告》，頁113-132。

83 柳本通義，〈總督府技師柳本通義提出河內博覽會二關スル出張復命書〉，頁10。亦可見於檜山幸夫，〈ハノイ博覽會と臺灣總督府〉，頁692。

類似的看法，也在日本貿易協會對日本參展品的強烈批評上出現，日本貿易協會認為此次參展物品項繁雜，又充斥著大量廉價品或坊間之物，例如東京和京都展區之參展物。就算是精美的展品，也因布展設置不當，例如名古屋展區擺放過多的七寶燒，而無法達到原先預期的效果。再加上部分展示品只符合日本人的興趣喜好，例如兵庫縣的清酒、絹團扇與手巾；石川縣的陶器，都沒有考慮到外國人是否能夠接受。因此，貿易協會對自身參展物品的評價並不高。<sup>84</sup>雖然如此，日本仍有多項參展品獲得銅牌以上獎項的肯定。<sup>85</sup>由此可見日人對於自身的高標準要求。

回顧日人舉辦或參與博覽會的經驗與歷史脈絡，不難想見日人嚴格的要求其來有自。日本國內第一次舉辦博覽會是在 1872 年(明治五年)，早於河內博覽會三十年前，而在 1903 年以前，日方已有 4 次內國勸業博覽會，以及超過十數次的各地方政府聯合或是單獨的博覽會。日人尤其領導階層更能體會博覽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博覽會的舉辦將有助於國家的「殖產興業」、「文明開化」。<sup>86</sup>在如此豐富的經驗背景之下，日人看待河內博覽會時，自然關注同屬列強之法國的策展狀態，及其背後的殖民策略，當然也相當在意自身參展的情形。例如柳本通義便曾批評：直到開幕當天，日本

---

<sup>84</sup> 日本貿易協會編，《千九百二年佛領東京河內府東洋農工技藝博覽會報告》，頁 132-133。

<sup>85</sup> 據筆者統計，獲得大賞者(此即前文提及的「超級文憑」)有 7 家業者、金牌者有 61 家業者。各類得獎名單詳見「受賞人名簿」，收入日本貿易協會編，《千九百二年佛領東京河內府東洋農工技藝博覽會報告》，頁 152-170。

<sup>86</sup> 感謝審查人提醒筆者應注意日本舉辦與參與各式博覽會的歷史脈絡，並提供相關資料，以了解日方看待河內博覽會的經驗基礎，筆者謹致謝忱。關於日本舉辦各式博覽會的經驗，詳見呂紹理，《展示臺灣》，頁 76-100，其中關於各博覽會的統計詳見頁 93-100。

展區還有三分之一分量的展示品尚未布置完成，也讓對日本製品有興趣的歐洲人敗興而返。為此，柳本毫不客氣的指摘：過往未曾有過這般惡劣錯誤的日本，卻在此次犯下了如此大的笑話，可不是與日本商工業進步發達的意圖背道而馳了嗎？<sup>87</sup>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日人對於法殖民者、中國，甚至是對自身有這麼嚴厲的批評，他們有著嚴格的要求。經驗脈絡的不同使觀看視角產生差異，也影響各國參觀者對自我與他者的評價和書寫，從而呈現出不同的關懷面向。博覽會永遠是一場未完的競逐。

## 五、結語

經由上述討論，我們可以了解 1902 年河內博覽會各國參觀者由於觀看角度的差異，使其書寫內容也各異其趣，正好提供我們進行各國相互比較的切入點。這次博覽會既是由法殖民政府於其殖民地越南上所舉辦，法越之間所形成的「殖民者——被殖民者」的關係，自是這場博覽會的重心。我們可發現在官方宣傳裡，法殖民政府極力展示其治理印度支那的政績，及其所帶來的富裕，強調法國殖民政策的成功，以及工藝科技和精神文明的進步。身為被殖民者的越南知識人黎文啟亦在其作品《附槎小說》裡，熱情積極地呼應法殖民者的政策，體察殖民者的用心及效益、可說是這場博覽會的最佳代言人。但中國與日本參展者則看出殖民者在富麗堂皇掩映下的虛華，以及潛藏的治理危機，顯然距其言說的強盛仍有一段距離。

黎文啟期待越南人能透過法國人的提攜指導，提升自身的工藝技術和精神文明，走向更完善的境地。但這種將「開化之望」寄託在殖

---

<sup>87</sup> 柳本通義，〈總督府技師柳本通義提出河內博覽會二關スル出張復命書〉，頁 9。

民者手裡的景象，看在中國人眼裡，簡直是亡國之態，也遭到中國人相當嚴厲的批評。若進一步深思細究，則可以發現中國參觀者這樣的激烈態度，很可能是來自於面對中法越三國關係的改變，一種出自於本位主義的反應，顯示其喪失宗主國地位的焦慮。

值得注意的是，當黎文啟將越南與未開化民族擺在一起觀看和比較之後，他發現各項條件都好於未開化民族的越南，在法國幾十年來的保護之下卻停滯不前。在看見以越南女性為形象的裸女圖之後，更感受到民族國家受制於人的苦痛。由此可知，在差異的對照之中，黎文啟反而有更冷靜清醒的認識，也表達他對越南現實處境的關心和焦慮，而非只是甘受殖民者的媚外之人。他對法殖民者的重層態度，讓他得以創造出喘息發展的空間，在配合殖民者的過程中，也一步步展現主體性，拉開與殖民者的距離。

在法越關係之外，中日兩國的參展特色，以及眾人觀看各國相互競逐的看法，亦是此博覽會值得關注的重點。對中國來說，中國參觀者希望能振興自身產業，並在參展作品得到優勝中強化民族自信心，尤其是與日本景泰藍(七寶燒)的競爭，這反映了中國在「後宗主國」時代，積極追步列強，以振國力的心態。但日本及越南參觀者卻未給予中國展品太高的評價，甚至是在有意無意之間忽略中國展品。相較之下，黎文啟對於日本國參展物有較高的讚賞，並從中得到日人窮變而自強的啟發，期待國人也能效法日本，見賢思齊。至於日本方面不僅批評法殖民者在籌辦過程中的好大喜功、準備不周，也從自身豐富的博覽會舉辦及參與經驗中，大力批判自身參展品的缺點，認為展場中充斥著能於一般商店街購得之中低價位的物品，並不符合日人對於出國參展品所應具有之水準的期待。

各國人士帶著不同的期待和目的來參展、觀覽，但大多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展現國力、走向富強，即便是身為被殖民者的黎文啟也關心

這個問題。這些國家同時也關注其他國家是否(能)走向富強，因為這牽涉到彼此勢力的消長。所以，他們相當在意博覽會屬於「誰的富強之業」。但認知與行動、意圖和實踐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以及不易克服的落差。換句話說，各國的「富強之業」是建構在自我言說、彼此觀看與相互競逐之間，各國邁向富強仍有長遠的路要走。本文嘗試透過各國參觀者的紀錄與書寫，來觀察他們在西方知識及科技架構、文明象徵與殖民處境下，對博覽會不同層次的體驗與態度，進而理解東亞各國乃至於東西方在相互觀照之下，彼此的形象認知與國家想像。就此來看，1902年由法殖民政府所主辦的河內博覽會，的確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切入點。

(本文於 2018 年 4 月 12 日收稿；2018 年 12 月 17 日通過刊登)

\*本文為科技部 106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在文明象徵與殖民處境下的欽羨、適應與省思——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越南人的博覽會書寫」(MOST 106-2410-H-110-053)之部分成果，謹致謝忱。本文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2017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 年 12 月 20 日)。承蒙講評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博士後劉家幸博士指正，復蒙《新史學》審查委員及編委會針對本文之論點、架構、史料運用與論述方式，提出中肯剴切的指正與建議，其所開啟的諸多思考，有助於筆者釐清論文盲點，修正原文不足之處，在此深表感謝。同時也感謝曾協助筆者撰寫此文的師友同學。未逮之處，文責自負。

附表 1 1902 年河內博覽會參展品分類暨翻譯對照表

編號	法文	中文	日文
第一大類	Archéologie, Beaux-Arts, Sciences, Enseignement	考古學、上等工藝、學藝、教授各等物	古物學、美術、學術、教育
第1項	Archéologie, Art ancien, Ethnographie, Religions	考究古碑、古物、人類、教務各物	古物學、古器物、戶籍學、宗教
第2項	Peinture, Sculpture, Architecture	繪畫、雕刻、建造各物	圖畫、雕刻、建築
第3項	Gravure, Lithographie, Typographie, Photographie, Librairie	刻板、石印、印字照相、書籍各物	版畫、石板印刷、活版寫真、畫圖
第4項	Musique et Art théâtral	樂器、戲具	音樂、演藝
第5項	Cartes et Plans Instruments de précision	地圖、畫圖具	地圖、圖形、測量器
第6項	Économie sociale et Colonisation	治理屬地及常人理財務	社會、經濟、殖民
第7項	Médecine, Chirurgie, Hygiène, Salubrité publique	醫學、醫學外科、衛生、保生各事	醫術、外科醫術、衛生、清潔法

第二大類	Agriculture, Commerce, Industrie, Mines et Métallurgie	種植、商務、手藝、礦物、 鍛鍊各物	農、商、工、礦物、冶金
第8項	Matériel agricole	農務材料	農業品
第9項	Industries agricoles	種植藝	農業的工產物
第10項	Produits agricoles alimentaires et industriels	農產食物、製造食物	食料用及工藝用農產物
第11項	Boissons fermentées et Spiritueux	釀酒法	發酵及酒精の飲料
第12項	Sériciculture. Pisciculture, Aviculture, etc.	蠶桑、養魚、珠蚌各物	養蠶、養魚、養蠔
第13項	Produits des Forêts	樹木	林產物
第14項	Horticulture et Plantes d'ornement	種花、陳設花草各物	園藝、裝飾植物
第15項	Mobilier, Décoration Chauffage et Ventilation	桌椅彩飾、烘煖換氣各具	家具、裝飾品
第16項	Céramique, Cristallerie, Verrerie	陶器、料器玻璃	陶瓷器、結晶物製造玻 璃
第17項	Fils, Tissus, Vêtements	棉線、絲、衣服	糸類、織物衣服

第18項	Cuirs, Peaux, Fourrures	毛皮、皮板、皮貨	毛皮、革
第19項	Parfumerie et Bimbeloterie	香料、玩物	香類及玩具
第20項	Orfèvrerie, Bijouterie, Horlogerie Coutellerie	金銀器、首飾、鐘表、刀 剪各物	金銀細工、裝飾品、時針、 小刀類
第21項	Produits chimiques et Pharmaceutiques	化學材料、藥物	化學品、藥品
第22項	Industrie du papier	製造紙張	紙類製造業
第23項	Mines et Carrières	礦產、石礦	礦物、坑石
第24項	Métallurgie	鍛鍊各物	冶金學
第三大類	Génie Civil, Travaux Publics, Mécanique, Électricité, Moyens de Transport	建造工程、機器、電氣、 運載各物	工學、土木、器械、電器、 運搬
第25項	Matériel et Procédés du Génie civil	營造材料	工學用器械及方法、建 築材料
第26項	Modèles, Plans et Dessins de Travaux publics	工程圖式	土木の標本、設計、圖 案

第27項	Machines à vapeur et Machines diverses	汽機各種機器	蒸汽機關及び各種機械
第28項	Machines-Outils et Appareils divers de la Mécanique	各種機器傢具	器械學の各種機器機關
第29項	Électricité	電氣具	電氣機
第30項	Électro-Chimie	電氣製造器具	電氣化學
第31項	Applications diverses de l'Électricité	各種用電法	各種電器の應用
第32項	Matériel de Chemins de fer et Tramways	鐵路火車	鐵道及び輕便鐵道
第33項	Matériel de la Navigation	行船各物	航海用具
第34項	Aérostation	氣學各物	輕氣球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編號 01-27-013-01-077。
- 北京工藝局，〈北京工藝局經理河內赴會啟〉，光緒二十八年(1902)八月二十三日，收入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清末)時事采新彙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 1259-1260。
- 奴痛，〈河內博覽會廣告文〉，《漢聲》，6(東京，1903)，頁 108-109。
- 〈記客語越南事〉，《外交報》，38(上海，1903)，頁 2A-B 面，收入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編選，《(清末)時事采新彙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 2420。
- 阮福綿家(Nguyễn Phúc Miên Triện)、武文豹(Vũ Văn Báo)、阮澂(Nguyễn Trùng)，《己丑年西行日記》(*Ki Sửu Niên Như Tây Nhật Ký*)，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藏抄本。
- 武光牙(Vũ Quang Nha)、陳廷量(Trần Đình Lượng)、黃仲敷(Hoàng Trọng Phu)，《使西日記》(*Sứ Tây Nhật Ký*)，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藏抄本。
- 徐淡(Từ Đàm)，《覽西紀略》(*Lâm Tây Kỳ Lược*)，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藏抄本。
- 陳廷量，《西行日程》(*Tây Hành Nhật Trình*)，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藏抄本。
- 羅貫中著，陳曦鍾、宋祥瑞、魯玉川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 黎文啟(Lê Văn Ngữ)，《附槎小說》(*Phụ Tra Tiểu Thuyết*)，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藏抄本。
-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仏領東京河内府ニ於テ万国博覧会開設一件 / 分割 1》，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明治三十七年三月七日(1899-1904)，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2083569500。
- 日本貿易協會編，《千九百二年佛領東京河内府東洋農工技藝博覧會報告》，東京外國語大學圖書館藏，1904。
- 柳本通義，〈總督府技師柳本通義提出河內博覽會ニ關スル出張復命書〉，明治三十六年(1903)二月十三日，收入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03，明治三十六年永久保存第 7 卷，第 808 冊，頁 1-101。
- Bourgeois, Paul & Sandoz, G.-Roger. *Exposition d'Hanoi, 1902-1903: Rapport Général.*

Paris: Comité Français des Expositions à l'Etranger, 1904.

Doumer, Paul. *L'Indo-Chine Française: Souvenirs*. Paris, Vuibert et Nony, 1905.

Doumer, Paul. *Situation de l'Indo-Chine (1897-1901): Rapport*. Hanoi: Schneider, 1902.

Ducarre, Albert. *Mission à L'exposition de Hanoi et en Extrême-Orient 1902-1903: Rapport Général*, Officiel de Madagascar, Numéro Spécial du 10 Décembre 1903,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nF).

Ministère des Colonies,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Exposition de Hanoi en 1902: Catalogue Officiel Métropolitain*. Paris: A. Bertrand de la Galerie, 1902.

## 二、報紙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

《大公報》(天津)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

《選報》(上海)

《萬國公報》(上海)

*L'Exposition de Hanoi, Paris*.

## 三、近人論著

克里斯多佛·高夏(Christopher Goscha)著，譚天譯，《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0。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11。

李一平，〈論法國對印度支那殖民政策(1887-1940年)〉，《南洋問題研究》，4(廈門，2004)，頁48-57、97。

李丹，〈1902年河內博覽會述略〉，收入馬敏主編，《博覽會與近代中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147-165。

梅秋瓊，〈景印《周易究原》弁言〉，收入黎文啟，《周易究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VII-VIII。

- 陳重金(Trần Trọng Kim)著，戴可來譯，《越南通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 趙汝珍，《古玩指南》，青島：青島出版社，2014。
- 趙祐志，〈躍上國際舞臺——清季中國參加萬國博覽會之研究(1866-1911)〉，《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5(臺北，1997)，頁 287-344。
- 盧建銘，〈越南法屬時期河內的都市經營策略〉，中壢：中原大學建築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羅景文，〈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 楠元町子，〈万国博覽会に見る明治政府の国際戦略——1902年ハノイ博覽会と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博を中心に〉，《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37(愛知，2012)，頁 105-120。
- 檜山幸夫，〈ハノイ博覽会と臺灣總督府——パンフレット『EXPOSITION DE HANOI』を中心に〉，收入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編纂委員會編，《臺灣總督府文書目錄》，第8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1，頁 671-700。
- Huỳnh, Văn Tông(黃文從). *Báo chí Việt Nam: từ Khởi Thủy đến 1945.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Nxb.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2000.
- Jean-Paul, Alain. *Dictionnaire de L'ethnologie Malgache*. Paris: Publibook, 2015.
- Oger, Henri. *Kỹ Thuật của Người An Nam*. Edited by Philippe Le Failler and Olivier Tessier, translated by Trần Đình Bình and Sheppard Ferguson. Hà Nội: Nxb. Thế Giới, 2009.
- Vũ, Thị Minh Hương (武氏明香). “Hội chợ đầu xáo Hà Nội xưa qua tài liệu lưu trữ.” *Xưa & Nay* 74 (2000): B-C.
- Vũ, Thị Minh Hương (武氏明香). “Triển lãm và hội chợ ở Hà Nội trước năm 1945.”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2 (2000): 59-66.

#### 四、網路資料

- 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黎文啟《附棧小說》提要，[http://140.109.24.175/pasweb/Opac\\_book/book\\_detail.asp?systemno=0000001381](http://140.109.24.175/pasweb/Opac_book/book_detail.asp?systemno=0000001381)，擷取日期：2017年11月22日。
- 不著撰者，〈七寶燒——日本的「景泰藍」〉，<https://read01.com/6GGkA7.html>，擷取日期：2017年12月1日。
- Hanoi la Vie • Leisure (河內生活 • 休閒娛樂). [http://www.hanoilavie.com/index.php?lang=eng&action=voir\\_gallerie&rep=Loisirs](http://www.hanoilavie.com/index.php?lang=eng&action=voir_gallerie&rep=Loisirs). Accessed December 5, 2017.

## Who Will Achieve Prosperity? The Observations and Writings of Chinese, Japanese, and Vietnamese Fairgoers to the Hanoi Exposition of 1902

Ching-wen Lu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France, which occupied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exposition, held the only fair outside its territory in 1902, the Hanoi Exposition. In addition to France and its colony in Indochina, several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ir colonie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is exhibition. Each participant held different purposes and expectation from the others. The French colonists wanted to show their power by this exposition. However, the fairgo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castigated the French for the failure of their colonial policy and revealed their real ambition in holding the fair. Le Van Ngu, the Vietnamese intellectual, on the one hand upheld and praised the French colonist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was clearly aware of the reality of Vietnam's colonized situation. As a result, he had mixed feelings about the French colonists. Meanwhile, in addition to placing empha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nce and Vietnam,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as also revealed through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Hanoi Exposition. Through the documentation from each country,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different layers of experience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exposition in the frameworks of Western knowledg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s, symbols of civilization, and colonial situations. This article further highlights the issues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imagined homeland of each country in East Asia, and between East Asian and Western countries.

**Keywords:** exposition, Hanoi, colonial, exhibition and gaze, Le Van Ngu